林志思评

从八股文看新时代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作者自序
- 法文版序
- 第一章　“千年王国”的梦想
-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1)
-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2)
-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3)
-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4)
-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5)
-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6)
-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1)
-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2)
-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3)
-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4)
-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5)
- 第四章　草原上的锻炼者(1)
- 第四章　草原上的锻炼者(2)
- 第四章　草原上的锻炼者(3)
- 第四章　草原上的锻炼者(4)
- 第五章　神圣的大札撒(1)
- 第五章　神圣的大札撒(2)
- 第五章　神圣的大札撒(3)
- 第五章　神圣的大札撒(4)
- 第六章　强敌相遇(1)
- 第六章　强敌相遇(2)
- 第六章　强敌相遇(3)
- 第六章　强敌相遇(4)

作者自序

（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喜谟•巴克霍森）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战，追根求源，原是欧洲内部的事件。然而，这场战争却演变为第一世界大战，这主要是因为此时整个世界的命运掌握在欧洲手里，自然世界的形势也是由欧洲决定的。大战以来，还不到二十年，整个世界的政治面目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时至今日，倡言世界命运系于太平洋之说，几乎成了一种普遍认同的理论。欧洲的新战争很可能不牵动世界其余各地，而欧洲呢，虽然坐在四围巩固的营垒里，却难于不过问太平洋的战争。因为，在今日，欧洲的命运已经系于东半球事变的进展，而欧洲将从东半球的事变里决定它的永久形势。

不管如何，我们开始习惯于这种新的状态，而并不像旧时代的国人那么天真地相信世界的中心是与市场的中心相符合。可是，如若我们想到过去历史的重心绝不是永久在欧洲，或许我们对于眼前经历的事实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将加紧武装以应付未来的威胁。直至十五世纪末期为止，在政治上，欧洲似乎始终处于世界文明的旁观者的地位，恰如它在地理上所处的地位一样：面积有限而傍于亚细亚大陆的一个半岛。西方人真正进入世界文明，乃是在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中层出不穷的发明当中，在这一时期，他们几乎降服了整个世界。然而，即在这个时代中——到今天也不过相隔了二百多年年，有一批来自亚细亚的军队竟然威吓了维也纳的门户。欧洲霸权的时代——前后不过五百年，似乎就达到了它的末期，我们已经看到盛极必衰的起初几种征兆了。

中世纪欧洲的大事，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往往也不甚高明；然而，在同时代，亚洲却是一段范围极广大的世界政治的世纪，我们在这方面所知道的却极其有限。本书叙述成吉思汗及其帝国的历史，我想大多数的读者都能阅读，它应当不仅限于扩大历史的叙述，同时也

应作为未来的蠡测。我们不仅探索成吉思汗及其所建立的世界帝国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这段历史已经不能局限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有助于从地理环境等方面综合考虑成吉思汗及其草原帝国对世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广泛影响，对我们了解世界的格局大有裨益。

在最近几年中，曾有若干叙述成吉思汗传记的著作。为首的应推哈罗•兰伯（Harold Lamb）的杰作。这些作品，大概都采取了小说的体裁，仅仅注意蒙古帝国创造者的身世。将地球上各国最奇特和最广大的国家的全部历史写出来，我们觉得是更有必要的，而这个国家的宗教、经济、军事的面目，都在这部历史里据实表露出来。

蒙古帝国史的材料来源，主要方面是分属于中国、阿拉伯、亚美尼亚的纪年史，如非专门学者便不易阅读。但有一批研究者，经过多方努力后，曾翻阅过浩如烟海、极其繁杂的材料，并将之集中起来。第一部应推何威士（Henry H. Howorth）分订四册的《蒙古史》，次为法国人多桑（D’Ohsson）及喀恩（Cohun）的著作。我们也曾参考了爱尔特曼（Erdmann），汉默•浦格斯塔（Hammer-Purgstall），格鲁塞（Grousset）的研究——他们曾翻译了蒙古王子撒难薛禅（Sanang Setsen）的纪年史，我们也利用了优尔（Yule）及其他历史学家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

法文版序

（法国人类学家乔治•蒙丹顿）

短促而辉煌的成吉思汗战功史，实为普通大众所未知悉。即使有谈到的，而成吉思汗帝国战功的枢纽，却因其罗列了自相矛盾的细事和次要的事绩，而淹没于琐屑的传闻中了。本书的特色即在于从纷繁芜杂中揭露了其中的线索。一般所持的论据都不免有着种种缺点，即它们都仅着眼于军事史的形态，就是说，仅囿于蒙古史的外形。本书则着重于它的内在生活和它的精神上的来历：以与乡村及都市的固定生活相对立而言，这乃是游牧生活的最后的昌盛时代，这个游牧生活，在处于今天这种相对静默的时代之前，曾达到它的最令人炫目的形态；更特别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游牧时期，较之孔教、佛教、基督教等，还处于原始宗教萨满教（Chamanisme，即西伯利亚东部及亚洲极北部的一种原始宗教）的地位，而无论在何处，它每遇到了它们，都一一压伏了他们。这些事实所以不曾被人知悉的原因，或许是因为蒙古骑士的活动中心是较近中国而不近欧洲，虽然他们也曾饮马于亚德里亚海（Adriatique）上；而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文明远在欧洲之上，任何地方她都比欧洲进步，且为文化的高峰；所以，如不仿效中国，即要将中国打倒——在我们看去，凡是中国的文化，应视为独立发展的一个萌芽，但是早熟的萌芽，有着动力的限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除了文化的事绩外，蒙古史又是一个种族史——不论是有心的或无心的，这个论断便使我们非阐发和确定那里面所包含的意义不可了。本书著者在谈到蒙古政治集合体——它是随各种时代而变迁的——的时候，总是说：蒙古种族。我们在译文里，每次遇到这个字眼用得适当的时候，即是说，在大部分场合中，总要保存这个字眼，理由如下：我们西方人属于欧罗巴种（彼此都属于大欧罗巴种或白种）；蒙古民族则构成了大蒙古种或黄种的核心。在这两种之间，则

有着突厥种族，我们不如把它叫做“鞑靼突厥种”（Turco-tatar），使之不至与土耳其的奥斯曼突厥种（Turc osmanli）相混，后者仅占着一小部分。那些鞑靼突厥人曾好几次被列入蒙古政治集团里面，或甚至居于领导分子的地位。可是，鞑靼突厥种或中央亚细亚西部的土耳其人（Touranien），在种族上，到底何所归属呢？在这个问题上，人种学家的见解各相悬殊；多数人是把他们列入蒙古种里，其余的则认为他们是欧罗巴种。我们则认为鞑靼突厥人的全体构成了一个地方的集合体，而非种族的集合体，其中有若干单位（例如谦河〈Iénisséi〉河源的索伊奥特〈Soiote〉民族），确是真正的蒙古种，其他的单位（例如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思〈Kirghiz〉民族），是介于蒙古种与欧罗巴种之间，最后其余的单位（例如奥斯曼民族），则属于欧罗巴种。但是，像鞑靼突厥族的语言与蒙古的语言，虽然相隔很远，却有着亲属关系，像在那些历史事变里，这两个民族，或全部的或局部的，往往只构成了一个民族；像在肉体上，比较带有蒙古种成分的鞑靼突厥人是多于欧罗巴种的鞑靼突厥人，且占据了较广大的地面；最后一点，当我们在已有的典籍上受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又须无论在这个界限的那一方面用一个字眼加诸这个民族身上，因此，我们就很有理由说，从人种上讲，鞑靼突厥人即使不是蒙古人，至少总属于蒙古种。可是，对于蒙古人主张，或对于有人替蒙古人主张，将很多类似他们的民族都冠以蒙古种的字眼，这实在有着更精确的一点，可以解释其中理由。也像金栗色的北欧人为欧罗巴种典型的最特殊化的术语，也像北欧人每遇有表现他们性格的地方都认为他们势力的表现一样，蒙古的蒙古人——而不是其他如中国人的民族——虽然在程度上没有这么大的差别，也实为从乌拉尔山延至麦哲伦群岛的广大人群的人种典型，即一般所谓最纯净的、但实际上是最特殊化的典型，而成为我们人种学者所唤作大蒙古种的。换句话说，蒙古人在大蒙古种里所扮演的角色，恰是与金栗色种人在大欧罗巴种里所扮演的角色一样，而范围广大的蒙古政治世界的本体所具有一个人种的事实，总而言之，乃

是我们基于上述解释，在谈到蒙古人的时候，而可一般地引用人种这个定义的理由。

可是，这“蒙古人”与“蒙古种”的名词的产生，就如本书所阐述的，是依赖于制造这个蒙古功业的人物本身，即是说，依赖于成吉思汗这个人物。因为，为蒙古民族的历史曲线的来源，同时又为其最高峰者，乃是这个人物。而他的成功是那么伟大，且是伟大过于所有各洲和所有各时代中任何其他人在这方面上所取得的成功，遂使蒙古民族之最微末的后人，也永远追念他的功绩。虽然这种情形有其离奇的地方，我总可举出亲见亲闻的证据来。在一九二○年，我曾与北部蒙古人相处。当我们提到他们用以饷客的烧羊尾的时候，他们就追念了当时红白两派的斗争，另有两种关于本书历史题目的回忆，就永留于我的脑际了。没有一个夜晚——我在第一天就感到很惊讶，当我的主人们围坐于火盆四周，彼此用蒙古语交谈的时候，他们没有不谈到成吉思汗的。另有一个事实是关于 字形的记号，这个象征并不是某一个地方和最近某一时代的专有物，在几内亚湾、苏丹、欧罗巴，整个亚细亚，太平洋之外，直至旧墨西哥，我们都可以找到它；蒙古人常常摹绘 字形的记号，我曾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块砖头，在那上面有着两个用金属嵌的 字形。当我问蒙古人怎样称呼这种记号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成吉思汗的记号”。

有人说，成吉思汗带有一部分金栗色的容貌和淡色的眼睛，这就是说他身上曾带有金栗色种的因素。然而，这并不可以说成吉思汗所以成为伟大人物是靠这种因素；他所拥有的金栗色种的成分，或许与其他金栗色种因素毫不相干。在各个国家里，当我们看到许多伟人，譬如，带了黑种的因素，我们虽则相信对这点尚有疑问，但总可问道，这某几个伟人虽不是靠带有某一种族的血统，但是否靠某几种极不相同的血统的混合——这句话的意思绝不是赞成全部的人民采用这样异种交合的办法。

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历史又一次告诉我们，时势是人创造的。或许事变是无可避免的，但它之所以如此，实群众使然；因为，无论事变是如何在任人宰制，而宰制者总是那些伟大人物，成吉思汗为伟人中的伟人，他的非常不世的成功，一部分是靠这一事实，即他拥有一批出类拔萃的战友，就是说有一批举世无匹的将帅，这个事实是屡现于历史上重大时期，或无宁说靠这个事实才有重大时期的产生。任何骑士都不曾获得如速不台（Soubotai）所曾有的功绩，他曾四度驰骋于高丽与布达佩斯（Budapest）之间，他曾于历时两年的转战中，遍历阿富汗、波斯、亚美尼亚、高加索、俄罗斯，且一一使之降伏，而这种种战功不过是以二万骑兵得到的，但这二万名骑兵个个是铁铸心胆的！

这种种战绩，显然是不能倚靠部落的力量而取得的。蒙古军事严格组织的研究，可使部落的传说不复存在，而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就是蒙古骑士经过一个地方后，仅留下几名代表，后来就没有叛变的事情产生。这是因为他们事先已用空前的恐怖手段来扑灭叛变的情形了；人们往往说恐怖是没有丝毫作用的，但特定的时期，它的作用不可低估。蒙古骑士似乎早已努力实现尼采的扎剌图士特剌（Zarathoustra）的教训："你要强硬，强硬得像金刚钻一样……。"

第一章　“千年王国”的梦想

一个游牧小部落的年轻首领，从亚细亚广大荒原的某一地点——那时他应须天天仅以维持生活的目标而奋斗；忽然下定了决心，为他本人及其民族，而出发向世界进军。到过了五十年他双目已瞑之后，他为几个儿子留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任何人绝未曾有的广大帝国。当成吉思汗开始他的功业的时候，他所要代其取得世界的这个民族，还未真正形成。身为孤儿，还在半童年时代，他所握着的无非是其卓绝的意志，其青年时代的毅力，及对其使命所坚持的不可动摇的信心。然而，大家全起来攻击他一个人：从他的乡邻及其部落的同伴，个个都像对待一个牲畜似的侮辱他，掳去他的年轻妻子，偷走他仅有的几头羊马，即如拥有数百万臣民之强有力的皇帝王公，对他无不如此。他这个小子，他这个荒原中被人轻侮的无出息人物，那时还不知道后来为其属部的王国及他们的名称，他却一一使之降伏了。许多知名的王公贵族，往往在他们的宝座将倾覆于危急万分的时候，才知道了他的名字。

其他不像他那样适合而也号为“世界征服者”的伟人，成功都比成吉思汗容易得多。阿提拉（Attila），成吉思汗把他尊崇为祖先并为后来他争取统治权所藉口的合法凭据，曾以一大批移民的狂潮拥向西方，不过他总会遇到战胜他的人物。凯撒曾能利用罗马政府所构成的精确的工具，运行绝佳的组织，但一到他染指皇冠的时候，这个工具便反过来把他打碎了。拿破仑跨上革命的战马而前进，而他的最精锐队伍是一七八九年的思想，并不是由他创造出来的。在他功业失败后，他虽仍保存残生，但是以俘虏的身份而保存。亚历山大是最类似成吉思汗的，他从其父亲手里承袭了世界上最精良的军队；他自己却不过是一个武人，且短命而死；在他死后，他的帝国，不过维持了百年即告颠覆，而成吉思汗的子孙，在成吉思汗死后一百年，依然无可否认地统治了当时所已知的世界五分之四的土地。

“亚细亚需要一个人物”这句话——战败的拿破仑口中所吐出的名言，在六百年前，成吉思汗已经使之实现了。

然而在历史上，并没有不可思议的奇事。这并不是宽大的上帝愿将地球奉送给这个伟大的蒙古人。在一个天才卓越的人看来，政治从来不过是可能的技术。唯有那些有野心的好美的及有奇癖的人物，才能成就非凡的功业。或许，成吉思汗所遵循的以攫取强权的路径，如若我们只管估量其表面上的情况和表面上的物力均衡，则将被视为不合理的雄图和不可思议的情形了。可是，它实际上比任何事物都合逻辑，都有计划，成吉思汗的事业无非是靠着可能的条件，他成功的一切计划都是根据可能存在的条件。

当成吉思汗开始创业之时，他几乎是白手起家，仅藉最贫乏的土地，来锻炼他的子民，使之处于主宰的地位。他事先并未注重于任何移民的行动及任何复杂的理想，他最初并没有完整的军队，也没有国家的建制。不过，他的创业，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他绝不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和一个行险侥幸的人。

的确，成吉思汗是创造历史的人物之一，亦或是其中最伟大的人物。成吉思汗明白是历史给了他机遇。他感谢历史的赐予，而且力求符合它，诠解它的意义，听从它的安排，并加以利用。他自以为是它的继承人和它的执行人。历史超出了他个人的根基，培养了他的力量，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毫无来历的篡夺者，而历史是靠他来维持的。必然，这种根基是比寻常的更深远更深邃。而他追溯源流所遵循的路径也是更难于认识的。如要寻觅统治世界的锁钥——这个锁钥是为知道应用它的人而设的，在这种情形中，则必须一个非常的人物。越是有着手段高强和脑筋灵敏的人物，幻术者的神秘力量越是必需的，这种力量是足以明察宝藏的深穴和不可见的暗流。

成吉思汗在亚细亚土地上所展现的宝藏与暗流，在开始的时候，不过是梦幻而已。这是伟大过去的半神秘的传统观念，中亚细亚游牧民族的“千年王国”的幻想，被认为曾经存在，且应当重新实现。传统

观念与梦幻便成为他的天才政治的可能条件，而他就将这一理想付之于实践。已死的过去与将生的未来成了他为之奋斗的现实依据。

德国有一位浪漫派作家曾说："没有梦想力的人，就没有生存力。"务实的政治家成吉思汗在一个没落的和自相摧残的民族当中，不仅有着梦想本民族统一与发扬光大的力量，同时有着逐渐实现这些梦想的力量。成吉思汗的血液中燃烧着他的民族得天独厚的信念，最初却必须以火与剑强迫他的民族，使之承认他个人在这个民族中的伟大地位，这是因为他的理性和他的志愿的力量并不在他的梦想的力量之后，所以荒原的无家可归者摇身一变而成为"成吉思汗"（即最强大的君主或万汗之汗）。他的血统中所得到的历中遣传，极大地增长了其为本民 发展壮大的自觉心。

而且，成吉思汗一刻也不曾忘记他的发祥地以及他可资以创业的唯一条件。是他，一手推翻了世界，但绝不敢丝毫更动这个唯一的东西：他的民族的习惯与法则。他曾冷酷地使亚洲服从他的约束，犹如他自己服从这个法则的约束一样，即使有时他须偿付了他的肉与血的代价。出身于盛行着千年不绝的习惯的世界里，他是一个血与理性的保守者。当他在弥留之际，他对儿子们所讲的最后几个字是："遵守法则！"他的儿子们曾遵守法则，结果帝国安如磐石，而且疆域得到扩展，国力强盛如旧。但一到他的孙子们违背了法则，帝国便瓦解了。

如果我们撇开不提成吉思汗荒原故土的地质及其习惯，则无从认识成吉思汗了。他所展现于我们眼前的，与其说是一个有个人特征的人物，无宁说是一个种族和一般游牧生活的超人的化身。在他身上，集合着——这当然是历史上最后的一次——纯粹中央亚细亚游牧生活的所有精华，后者达到了无可言喻的伟大程度，从而使整个世界的面目发生了变化。世界的均衡又一度中断了，历史似乎从此后要追随一条新的路径，并决定了反对定居民族，反对农业民族，反对"文明民族"，而赞助时刻前进的野蛮民族，赞助游牧民族。

然而，这已经是太晚了。这一个“失之太晚”便是成吉思汗的计算里唯一的错误，实则这个错误也是他所不能纠正的。唯一独尊的志愿——即使他成了像上帝那么强大的人物——虽然可以一时地掌握时代的车轮，但总不能使之遵循一条相反的路径。最重大的历史恐慌是过去了。游牧者的梦想——即将整个大地成为唯一的遍布牧群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的帐篷的草原——却不曾完成。蒙古人毕竟人数太有限，随着征服地区的扩大便分散开来，一次次的远征最后变得似乎徒劳无功，空费心血。敌人在第一次奋击中所不能以武力得到的，他却以消耗精力的战争得到了。文明则以超越游牧人用为手段的武器攻击成吉思汗的后人。后者的明哲精神却消灭于亚细亚各种宗教的纷争中了。纵欲和酗酒更剥夺了蒙古人的精髓，到最后，他们抛弃了法则，而这法则恰是唯一以力量赋予他们的和在他们马蹄所到之处保护他们的祖国的。成吉思汗的思想现在被违背了，他创业的基本力量被消灭了，因为他的法则是必须区别蒙古人与其被征服者，并须使蒙古人稳居统治世界的地位。从此之后，无论他们是当时被打败、被赶走，或是如在印度和俄罗斯那样，还能在外国的宝座上维持了好几个世纪，并从北冰洋到了赤道，还能打了许多胜仗，实则两者是无所差异的。他们已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了；他们丝毫不记得他们的大首领与创业人当初所嘱咐他们的伟大任务了。

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历史是中央亚细亚游牧民族所主演的惨剧（战争或者征服毕竟造成很大的破坏，说叫惨剧应该不为过——译者注）的最后一幕。这个民族，在前后一千多年中，曾离统治世界仅有一步之遥，而在十三世纪中，在一个天才领袖的超凡的毅力的领道下，他们又一次举行了一番惊人的扩展。在他们的地位登峰造极之时，他们自己也消耗尽了，他们征服了世界的广大地区，并使世界经济、文化、军事等得到催化，世界的格局和文化交融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演出惨剧的地点是在亚洲。白种人不过感受了一番轻微的痛苦，颠摇于地狱的旁边而自己不曾看到。由于民族分化政策等点燃了亚洲各地人民的反抗烽火。成吉思汗缔造的世界帝国的命运便在这场复杂的政治、宗教、文化斗争中确定了。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1)

人类所居住的地方，可赋予居住其地的种族与人民以一种特色。所以，一个地方的政治历史便是它的地理和气候的结构的一种忠实的影像。这个法则就是欧洲史与亚洲史根本差异的原因。

欧洲幅员偏小，它虽然分裂为许多国家，但从某一地点到另一地点，一般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与界限。所以，欧洲很早就开始表现了使泛欧罗巴历史得以构成的那些因素。在它的地理上，各部分之间互相接触变得相对容易。某种程度上的重大事变总不可能局限于某个地方，它们不久就在整个欧洲内部发生反应。即使有两个大山脉，阿尔卑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也不能构成界限，而逐渐被制服了，因为海洋的温和气候消灭了它们的许多险要。海岸线的充分发展与地中海的安全坏境，在很早的时代，就已经促成航海业的进步，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欧洲各地互相交通的可能性。

假如我们设定在欧洲各民族里，很早就有固定生活和各民族分立一种剧烈的倾向，但其中总有许多壤地相接的土地存在，使他们各自赖以繁衍的根源不至枯竭。正像一个流通瓶的构造一样，在欧洲各部分之间，每次发生变故后，又重新恢复均衡。这种情形的结果，是在欧洲发生了一种共同的命运和一种包括整个欧洲的进展。不过，各小部分表现了彼此相当差异的形态，以制止欧洲完全集中的倾向占了优势。

亚洲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在亚洲各地之间，天然设立了许多隔离物，将它分裂成了那么复杂的状态，而我们使用“亚洲”的名词，几至不甚相称，更不用说“亚洲史”的名词了。不过，这块大地的各部分虽然黏在一块，实际看来，它们各部分所共同的地方，可使它们互相结合起来的成分，是不及其使它们彼此隔绝的成分。亚细亚惯性地受一种政治地理的法则，一种离心力的作用所支配，它们从亚洲的核心发作，不使各地联合起来，也不使之互相对立，但却使之分化。

我们一看亚洲的地图，便可明白亚洲史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法则与倾向。

在亚洲的中部，盘踞着一片广大的山脉，后者向本洲各方向伸展它的支脉。我们几乎可用蜘蛛网来比照这种结构。青藏高原构成亚洲的脊部，帕米尔——世界屋脊——构成头部；从这个中心伸展向各地的山脉，就相当于兽之四足。在这各山脉之间，伸展着亚细亚地面的各部分，广大的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这些地区大都受了江河的灌溉，所有那些江河全都发源于中央高原的脊部及其山麓的。

在印度那一部分，东北临喜马拉雅山，西北临兴都库什山。这两个山脉都发源于帕米尔。流经印度的那三条大河：印度河、恒河及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流入印度后的名称——译者注），都是发源于喜马拉雅山。

青藏高原的延长地，伸张如弧线的形状，穿过中南半岛（旧称印度支那半岛——译者注），而以它的支脉展至巽他群岛。这些山脉完全隔断了印度部分与中国部分。中国受了黄河与扬子江的灌溉；这两大河流，也像南亚次大陆的大多数的大河流一样，都发源于青藏高原。

中国的疆域，在西北方大致以昆仑山及其延长线为界线。这个山脉起于青藏高原北部，伸长至贺兰山及其他各山脉，蜿蜒穿过东亚一大部分。在这支山脉上，留有中国万里长城的遗迹，而它斜走北部，又重新达到高度很可观的兴安岭，后者切断了中国东北地区与蒙古高原。这支山脉将中国沿海各省及肥沃的流域的平原地带与较陡峻而不易攀登的高原相隔绝。这些高原——主要是西藏、新疆、蒙古高原等——时常被人概括地称作“上亚细亚。”

上亚细亚这一区域，南端与东端是沿着中央亚细亚的山脉，即昆仑山与兴安岭，北端与西端则为从帕米尔北部的各山脉所限，最重要的是天山和阿尔泰山。这个地带，完全与海洋隔绝，水量稀少，而在最大部分的地方，多为海拔很高的沙漠所占据（如戈壁及塔克拉玛

干，Taka-Makan）。在多山的边界上，有若干处被切断了，这些断裂带因而成了高地进入低地的门户。

最后，从“世界屋脊”又向西部伸展了一脉山峦，遮盖了阿富汗、波斯（现在的伊朗高原——译者注）、土耳其、小亚细亚等地。发源于帕米尔的锡尔河（Syr-Daria）和阿姆河（Amou-Daria）灌溉了这个区域，而且越过那些沙漠而达到阿拉湖（Lac Aral 即咸海）。

湖泊、大山脉，起于北海，经里海、咸海、巴尔喀什湖（Lac Balkach）以至贝加尔湖而横穿亚细亚这个大山脉的北部伸展至西伯利亚平原，这一地带是与本洲其他区域完全不同。那一片遍布森林与草原的大地，像大海似的，接触着亚细亚多山各地的东部，发源于那些多山地的各条大河倾注于西伯利亚这片广阔的平原上。

这样概括地将亚洲划分为五个区域的地理结构，同时决定了亚洲历史的各种倾向和各种步调。

同样的现象，几?恒久不变地重复地按惯性发生：在其中一个区域内，产生了一番强有力的政治动向，则经过若干起伏不定的阶段和对敌势力的斗争后，结果就达到了这个区域的统一及其严格的政权集中。在这时候，这个区域就经过了一段文明昌盛的时期。

然而，这已经是它的末日了。因为亚细亚历史的无可避免的定律，和离心力的倾向，便在这个时候发生作用了。在它那里面，同样价值的组织没有互相拉近的可能性。曾经产生那些国家和那些相当重要的复杂文化的空间，是彼此相隔太远或为若干障碍物所隔断，那些障碍物并不是交通技术或军事技术所能克服的。新的亚细亚大强国——假如它不与亚洲外的国家发生冲突——终久是回到自己身上来。这种孤立的地位对它是很不幸的。它促成了内部的繁荣，以后则重新演出了分离和瓦解的现象。这个亚细亚强国，或者就陷于停滞状态，或者退化，且因内部不断的斗争而陷于分崩离析。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2)

凡以同样事变的不断重演的事实来估量中国和印度人，不免因屡屡看到他们所遭遇的命运而感觉疲倦。唯有外来民族，多半是游牧民族，并且来自上亚细亚或小亚细亚，干预了他们的国事，才使他们暂时兴奋起来。

然而，这种接触——是相当的稀少——也不能演变成为各种势力的均衡。有活动力的各中心，彼此相隔太远，亚细亚各区域简直是个个各自孤立的世界。紧张情状始终是潜伏的，逐渐累积，间隔了许久，直至可怖的爆裂发生起来。

最孤立的属于印度那一区域。东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使之不能同中国发生直接接触。兴都库什山是它的最脆弱的屏障，雅里安民族就是翻越这座山而进入印度各地。后来蒙古狂潮的最后一批波澜来到印度，也是经过同样的门户。在历史上，印度本身始终处于消极的地位。我们可以相信印度的荆棘繁殖地及低洼流域曾诱致了一切外来势力潜入印度。在印度的肥沃高原上，雅里安这个游牧好动的民族，在印度的湿热气候影响下，却变成了定居的与和平的农业居民。印度于撇开了西北部的被侵入地带之下，专心应付自己的内部问题；种族和阶层的问题便居于首要地位；内部政治几乎完全支配了印度历史的发展进程。

居住于中国区域内者，同样有和平的、文明的和务农的民族。虽然中国历史比印度历史起伏不定，其原因却不在于中国人身上。在掩护不得力的西北部边界上的接触，实为中国历史波荡不定的原因。中国对外政治的偶然的活跃，只可视为上亚细亚向黄河和扬子江各流域进攻所引起的一种冲动。当中原王朝有些朝代表现出扩张面目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无非是在于防止北部和西北部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举动可说是未雨绸缪的措施；中央王朝势力之远展至上亚细亚，完全是基于安全的需要。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印证了这样一个

事实，即不是中央王朝侵略了沿边各地，而反是沿边各地袭扰了中央王朝。在这时，新的主人翁——少数民族的人物，将他们原有的土地与中央王朝所支配的版图合并起来，元朝和清朝就是这样的入主中原的大帝国。农业民族对于侵入他们本族各地的外敌，历来即以坚忍的和英烈的抵抗来对付，但他们绝不会认定北部和西北部各地是隶属于帝国本身。中国的帝国主义并没有存在。中华民族多数时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我们可从万里长城这个纯粹防守的建筑物里，看出这个民族的性格。

关于亚洲大强国的政策，如中国和印度，配上了她们黏结于土地及其手工业的人民，当然是不在这个政策之列了。这个政治的角色是由其他两个区域，即上亚细亚和旧亚细亚来担任。地理上的结构便预先使这两个区域成为历史的活动中心。它们都居于离平地较高的地方，并拥有向各方进攻的出口处。它们两个都被人口增加而土地贫瘠的事实所推动，而将它们的力量向外发展。沙漠和辽阔的荒原，不能像农耕地区一样，成为永居的处所。在那类地方，能够昌盛的是那些游牧民族，可以大有作为的是那些伟大征服者。那是骑士民族的乐园，而他们在亚细亚历史上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因为这些民族能够通行无阻地超越本洲的远近各地及其险阻。亚细亚的精神，受了自然的限制，不得不与土地相黏结，但在旧亚细亚，尤其是在上亚细亚的游牧民族里，即在能够使之活泼有生气并使之产生实益的民族里，亚细亚的精神是经过锻冶了。亚细亚之所以生存于动荡与文化革新以及种种祸灭的过程里，多是它的游牧民族所造成的。

米太人、波斯人、帕提亚人，以及那些新波斯人的强大侵略国，在其充斥了雅里安的移入民族后，曾昌盛于旧亚细亚。第一个白种人的帝国的成立，是在这个时候，她是由波斯人创立的，在那时代，罗马国家还不过是一个小小城市而已。这个帝国的文化，幸亏是以农业与游牧的要素混合而构成的，曾闪出了五光十色的光芒；它包罗了欧罗巴、亚细亚、亚非利加的各种成分。波斯这个国家，那时位于世界

上最显著的地点，曾力抗来自四方八面的攻击，而不久后亡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人。每次遭逢灾祸后，波斯帝国仍旧巍然复兴，但她的最大成功，就是在上亚细亚的压迫之下，前后好几个世纪，她始终能尽力抵抗。

到了阿拉伯沙漠的骑军，在穆罕默德的绿旗之下，向东方猛进，而过于进化的波斯帝国才于更强壮的游牧民族的奋击下覆亡了。然而，在以民族立国的旧国家所在地上，却成立了一个以宗教立国的帝国。伊斯兰教从此传入旧亚细亚。现在，界限是泯灭了，唯有信仰会引人注意，而过去始终受压迫的突厥各部落，则和平地由上亚细亚一点一滴迁移到波斯的地面了。他们成为伊斯兰教的精锐部队的组成部分。突厥、波斯、阿拉伯的各种元素结合起来，造就了一个新的、卓绝的、昌盛的阿拉伯文化。水量丰沛的锡尔河和阿姆河（旧史名为雅查尔特河Iaxarte 和阿瞧斯河Oxus）流经这个富饶而人口繁多的国家。在那时，两河流域，即脱兰索士安（Transoxiane即河中府）和呼罗珊（Khorassan）各地，过着它们最昌盛的时代。不花剌（Boukhara）和撒马耳罕（Samarkande）则有了它们发达的市集与学院和农业，发达的灌溉技术使农业大为繁荣，马鲁（Merv）和也里（Herat）两城的人口竟达一百万之多。

在十一世纪及十二世纪，这个伊斯兰帝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因而与耶稣教的西方各邦以重大的威胁。历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在日出之地与日入之地的各国中间发生了一番新斗争的先兆。

然而，祸患却从东方而来。成吉思汗的西征部队来到了旧亚细亚，捣碎了伊斯兰的势力，并且使这个地方经受了战争的严酷洗礼，使之再也不能完全恢复起来。上亚细亚，自从上古以来，始终是游牧民族的大本营，现在却完成了它征服世界的最后和最惨烈的努力。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3)

我们所说的历史，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于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斗争中，因而达到了一种历史的互动、更替的目的。在这个斗争中，其中不仅有着各民族迁徙的事实，也有着各国家的兴废与各种族的混合与移动的事实。各种文化也从这两个基本成分的调和中而得到了它们特殊的性质。抑有甚者，耕种生活与游牧生活之混合，也就是文明的初胎。在人类生活的最低状态下，逐渐成立了收获生活的经济组织——这个组织的定义可由它的名目里看出来。随后，天时和地利的各种条件，将这个经济组织区分开来。一方面表现着游牧者和在高山放牛羊的牧人，另一方面则表现着原始的农民，后者就像至今在亚洲尚存的若干种陈旧耕种形式里完全不知培育车和榨乳的牲畜。所有这两种人民，游牧人民和耕种人民——前者拥有组织和强烈扩张力的天才，后者能以他的勤奋和忍耐种植土地——都要经过一段遥远的路程，以达到他们的经济形式的更高阶段。榨乳牲畜之饲养，曾经过一段起伏不定的历史，其程度恰与播种谷物所经过的历史一样。

所谓的文明人是这两方面进化的结合而产生的；他联合了这两方面实质的价值，不仅使商人和工业家受益，从事畜牧的农民也同样得到利益。

诚然，在世界上，保持其纯粹形态的游牧民族，已经逐渐消失了。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总是游牧民族变为农民；他们以征服者的资格来到后者身边，而为后者所吸收同化了。新的经济方式比原始的形态高明；纯粹的游牧民族与原始的农业民族逐渐为精耕细作的农业民族所淘汰。

然而，在这种自然形态下，游牧民族继续与生产方式较为先进的农业民族混合杂居。欧洲人的勃勃生机与其发展的需要，是基于那两种原始的成分调和顺利的结果，就是说，在这种调和里，充分呈现着动的本质。因为，所谓游牧民族，不仅限于猎人与牧人；其中也有海

上的游牧人民，他们以水面代替荒原与沙漠。外轻团（Vikings，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海盗）和诺曼底（Normands，主要来自挪威和丹麦两地的海盗）就属于这些海上的游牧民族。征服世界之半的盎格鲁-萨克逊人，身上就留下了一大部分的游牧生活的成分。

在欧洲，我们随处可以找到来自游牧生活的遗迹。那些遗迹曾在各个国家的构造上和各民族的理想上发生作用，它们会流露于政治的各种原则里。

这两种基本成分的混合，产生了自足生存的开化民族，而这个混合的程序并不是不经剧烈的爆发和冲突而发生的。在世界历史上，这个程序制定了它的动人的定律，一直延续到耶稣纪元第十世纪之后。当那几次各种民族大移动的时候，野蛮人与非野蛮人之间发生斗争，便成为特别尖锐的矛盾。今日已经成立了一种均衡，得到了一种稳定，但在现代的纠纷里面，仍然有旧日矛盾的存在，虽然是戴上了和改用了其他种种名目。

在欧洲，至少到了某一种程度，这个混合曾经在早期实现了。当日耳曼各民族迁徙的时候，斗争激烈的敌对双方都已拥有那两个基本的成分，而再经无多世纪后，欧洲便找到了其一定不移的位置，两种成分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使欧洲不久就可伸手而掌握世界的统治权。

在亚洲，同样的程序只能缓缓地辛苦艰难地度过，而从来没有达到它的终点。亚洲土地之辽阔与其本身的结构，妨碍了实际协调的成立。农业与游牧的彼此范围截然分开。其中往往发生了定居者与迁徙者之间可怖的冲突，而亚洲几乎变成了枯血的。但在上亚细亚，固然历来不断地供给新的进攻力量，总成为纯粹游牧生活的保留地，而不断构成一个恒久不变的危机。紧张性始终存在着，而震荡亚细亚的暴风雨始终总不肯平静。

到十三世纪初，上亚细亚游牧民族有了一个真正的领袖，这个领袖知道利用敌人的武器，组织进攻的力量，并由此发挥他的效能。

这个领袖便是蒙古人成吉思汗。在他的心目中，游牧生活的志愿与理想是本能的、自觉的；他为这个民族确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蒙古人统治世界，整个大地全归于游牧人！

十三世纪的暴风雨开始于上亚细亚。这个地带的发动的征服世界的力量，在历史上并不是创见的。许许多多迁徙的民族已曾从那些高原上下来了，因此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上亚细亚是“人类的摇蓝。”到今日，这个假定确是不能存在。我们应当承认各种各样的种族曾各自出现于世界上不同的地点。

有一件事是可以明确的：假如我们认为波罗的海东岸各地是印度欧罗巴系种族的发源地，这个种族从此地周期性地向南方推进，占据了欧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土地，那么上亚细亚及繁殖其地的种族，在旧世界的东部，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直至有史时代，欧罗巴和上亚细亚似乎是地球上移殖的两个仅有的中心。历来先是从这些中心出现了拥有火山爆发力的民族，这些民族处于征服者的地位，横扫了几乎完全处于被动的其他民族。再进一步说：双方敌人的力量往往互相进行拉锯战，而世界史也可作为两个种族的决斗史，他们带领了各自的部众，进行争夺霸权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上亚细亚的代表者占了上风，直至中古时代末期，若与上亚细亚的活跃力在世界上所鼓动的事变相形之下，欧洲的历史简直是瞠乎其后了。到近代新航路开通之后，天平才倾向欧洲方面。

上亚细亚种族的迁徙早在冰河时代已经开始。乌拉、阿尔泰（也叫做芬鲁、乌格烈安）系种族的代表者约在公元前二万五千年来到欧洲。拉本人和爱斯基摩人（两者都位于北极地带，文化、语言、肉体完全不同。前者属于欧罗巴种，后者属于蒙古种——译者注）便是这个种族的最纯粹的后人。这个上亚细亚种族与一种欧罗巴种族混合，便产生了东波罗的种族（是金栗色种的支系之一。——法文本译注）。在那时候，或许亚细亚土著也曾取道北极地带而进入美洲，那

时的北极地带当以与今日不同的气候条件而被他们所制服。比较人种学曾在亚美利加土著与亚细亚土著之间发现了彼此有关系的明征。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4)

至于乌拉、阿尔泰系种族在亚洲各地史前所处的地位，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关于上亚细亚游牧种族的初期史材料，我们也不是很多。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纪年史是我们唯一的材料来源。然而这个来源并不丰富，因为此前中国人不甚注意人种学。

中国人说，在公元三千年前，他们从西方（黄河流域上游——译者注）来，占据了陕西地方，那时遇到了“北方野蛮人”（即北狄，编按）。从这个时期起，中国整个对外政策的形态是以其与那些野蛮人的关系为标准。其初，中国人绝未说到那些野蛮人的人种结构及其组织。他们只将后者名为夷狄，将后者的主要驻地限于满洲、蒙古及新疆各地。我们不能在汉族人与乌拉、阿尔泰人之间证明出一种世系的关系来。这个关系假如存在着，也无非是辽远的，他们应于极古一个时期彼此分离，他们彼此的文化状态是大相悬殊的。加之，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相形之下，汉族人则拥有一种单音的语言。

在中国人所饰以不甚好听的名字的上亚细亚各种乌拉、阿尔泰系民族中，最有势力的是突厥、鞑靼及东胡各族（后者为满族人的祖先）。这些民族也与高丽人及日本人有某种亲属关系。至于蒙古人——我们先应特别说明，还不能够列入这一个表里。他们从来不会以一种种族的地位存在着，而这个小部落，第一次于公元后九百年以“蒙古”之名稍见于史册，他们好像仅为突厥鞑靼种族的无数派系中的一支。属于这个部落的成吉思汗，后来以一番隆重的举动，将新统一的上亚细亚一切各民族冠以“蒙古”的名称。所以，我们不能说有蒙古民族，更说不上有蒙古种族。这单是因为东方的人种混合，于中古时代中，在蒙古领导之下，进入欧洲的视觉范围之内，所以一个统治者小集团的部落名字，竟被采用以指明一切“黄种民族”。

在人种学立场上，企图细分乌拉、阿尔泰系的游牧种族，这无非是一种徒劳无功的尝试，至少在这个种族未从高原下来的时候。各部

落是那么频繁地自由迁徙，或和平的或激烈的互相混合，因此，从这一世纪到那一世纪，他们的名目及其居留的地点都与前不相符合。在上亚细亚那边，生存的、移殖的、斗争的，建立了若干王国的及扰乱了四邻的，究其实，总是那个同样的乌拉、阿尔泰系民族。

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央王朝遇到了一个特别强悍的对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匈奴，这个民族逐渐强大，不断地袭扰周边民族，一再进入中央王朝的腹地。

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匈奴曾达到其极盛时代。或许，在那个时候，雅里安种族向旧亚细亚和印度进展，曾影响了前队趋向西方的游牧各部落，而将他们赶到东方来，因此发生了更猛烈的从上亚细亚拥入中原腹地的事件。

前后一千年中，中央王朝与匈奴的斗争持续不断，疲于应付；匈奴一度占领了中原王朝的大片土地。到后来，中央帝国在一个新朝代的统治下强盛起来，终于压倒了敌人。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公元前三世纪，秦朝进行了万里长城伟大的建筑。这个国防设施被认为将来可替中国本部防备北方和西方的入寇。起初，长城曾尽善尽美地实现了它的目标，而且它构成了良好的军事行动根据地，因而不久后中央王朝便反守为攻了。他们有计划地出兵征讨上亚细亚。约在公元前一OO年（西汉时期），凭着卓越的战略战术，西汉王朝击溃了匈奴主力。东方各部落几乎全部被歼灭，而残余人众便逃到贝加尔区域的山中。其他各部落的一部分，例如内蒙古各部落，被迫迁移到万里长城以内。这个措置的目的，是使那些驯服的游牧民族，随时代的转移，逐渐成为守护边境的同盟。后来，中央王朝将一个天才政治家的计划施行于西部匈奴的广大人众。

为使那些部落的力量不得近于帝国边界起见，帝国统兵大举进入西亚细亚。中央帝国军队的进展曾达到里海东岸。统兵官甚至要进攻波斯、罗马大帝国——中国人认这种帝国是半属传闻的。这个理想曾

使他的部队兴奋不已，但是中国皇帝却在恰好进兵的时候制止了这个行动。

公元前一世纪和公元后一世纪，都是不利于各游牧民族的。罗马、波斯、西汉这三大帝国到处进展，且巩固了她们的边界。迁徙无定的各部落所拥有的地面显见缩小了。然而，在中国遭受失败的结果，便使欧洲受了影响。前后一千年中，是西方压迫了上亚细亚；现在则产生了恰恰相反的现象。中国推动了各游牧民族；他们便散布于俄罗斯南部荒原的广大土地上。截至那时候为止，匈奴的战线是对着东方，现在却突然转向西方了。上亚细亚的一番轻微动作，便可使惊天波涛泛滥于欧洲。

有一天，蒙古高原各部落，在中央王朝的压迫之下，丧失了他们的自由和牧场，便卷起他们的帐幕而出发。匈奴就像风起云涌似的聚集起来，率领荒原的习于游动的部众，而向西方前进。在离开东方时候，他们名为匈奴，现在以匈人（Huns）的名号出现于西方了。他们一直进至欧洲，并压碎了居于欧洲东部的各民族。这种冲突便由那些民族传至已改向南方移动的日耳曼各部，而欧洲各民族的向外扩张便受了打击。

在卡塔罗尼安平原（Champs Catalauniques）败绩之后，匈人退居于多瑙河平原。侵入欧洲的上亚细亚游牧民族的第一个帝国因而建立起来。她的确不曾存在很久，因为她只有着动力，而没有静的力量。然而，匈人的本色仍留存于匈牙利的马札儿人(Magyars)身上，而在其后几世纪间，马札儿人便是扰乱欧洲的一个主体。在远东方面，人们没有忘却骑士民族的统治曾一直扩展到多瑙河平原。

匈人进入欧洲，曾产生了一种更重要的结果。就是在匈人退出之后，仍然在纵横于欧罗巴和东亚细亚之间，留下了一批连续不断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彼此连系着，像水流似的，从此后将东方的每个动静沟通着。成吉思汗不仅是在事实上曾利用了这个状态，他并且由此推出其统治世界的理论根据。因为，在十二世纪，上亚细亚不

再同匈人时代那样，滥费了几百万的民众。过去，各民族努力所造成的地位，对于传统的蒙古政治家，是再重要不过的。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5)

中央王朝不曾享受悠久的安宁。在帝国的西北部，又形成了一个新强国，这一次则是由一个突厥领袖的领导。这第二个上亚细亚的游牧国家已经现出了一种强硬的组织；她远非游牧部落的一种集体所可比拟了。牧人与猎人的艰苦生活，曾炼成了固有的道德习惯，国家的力量就是恰当地倚靠于这个道德习惯上。新强国以哈剌和林（Carakoroum）为都城。这个位于蒙古高原西部的荒原都会，后来在成吉思汗与其后人的手里，曾重新昌盛起来。

在这一时期中，中央王朝内部分崩离析：她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外敌的能力。她的藉分化以统治上亚细亚的政策，遇到对立的游牧部落中的一个能力超过其余的部落的时候，便不能发生作用了。这个可虑而常动的部族有了集合于一个本族领袖下的倾向，那时已实现了。不久后，突厥民族建立的帝国，便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整个中国北部，她统治了东自太平洋西至波斯王国东境的版图。俄罗斯南部荒原的各游牧民族，匈族的残余，屈服于来自东方的压力，也开始向西迁徙。他们以阿乏尔人（Avars）的名字出现于欧洲，泛滥于巴伐利亚与德意志，直至易北河（Elbe）为止。他们复修阿提拉（Attila）的堡垒，到两个世纪后，才被查理大帝（Charlemagne）所永远战败。那时候，在爱察尔（Etzel）堡垒里，发现了竟使欧洲市场发生黄金跌价的宝藏。

这一次，突厥人不仅以在东亚细亚掳掠及肆行攻击而感觉满足。游牧民族所具有组织和创建国家的惊人的能力，即他们所以大大强过其他亚细亚民族的地方，在这里第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他们的新国家里，他们将秩序整顿好，并建立了一种世界政策，而其锋芒指向西方。

条耳民族（Touraniens）与伊兰民族（Traniens）的积仇，曾在突厥与波斯边界的锡尔河剧烈战斗中发泄出来。不久以后，除种族的仇

视之外，又加上经济的纠纷。那个有名的“丝路”，即自西而东的商队要道，的确也可以同样的从波斯或从突厥领土经过，波斯人会有组织地扰乱这个交通。有一天，他们在边界上破坏了突厥族一个商队，突厥人自然不能坐视这种世界贸易安全的侵害，何况这个贸易乃是财源。

他们派遣代表前往拜占庭，请求与东罗马联盟，东罗马与波斯的夙愿也是他们所知道的。这个联盟的目标，以保护和便利自由贸易为出发点，合兵征讨波斯以恢复秩序，突厥允许援助罗马以抵抗任何敌人，并希望在与波斯战争期间，将商道改经俄罗斯南部荒原；双方应订立通商条约。的确，在六世纪，大批的中国商人曾经出现于拜占庭。

然而，拜占庭人已不是大外交家了，他们听任突厥人所贡献的非常机会脱手而去。其实，他们似乎不大高兴同那些野蛮人沆瀣一气，更重要的是那些野蛮人并且不是基督徒。他们守着一种依违两可的政策，无光荣可言；而且当突厥人要求代价时候，他们则设法推诿。到了突厥人终于明白他们不必要替罗马人冒险的时候，他们愤怒地终止了谈判。

而现在，是由他们提出条件。他们先出现于北海和伏尔加河（Volga），在那里确定了他们对于同宗各部落的统治权，并在罗马人面前占领了克里米亚（Crimée）。经过如此的行动掌握了北方通商道路后，他们立刻封闭了波斯边界。他们宣布说，唯有避经波斯领土而取道于北方通商路径的货物，他们才许其运入东亚细亚。

六百年后，类似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成吉思汗重复采用突厥的政策。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又因上亚细亚与波斯的经济纠纷而重新爆发起来。

七世纪，突厥大国的国力开始式微。在东边，复盛的中国一时能够摆脱游牧民族的羁勒，而且在上亚细亚各部落中充分利用各种矛盾

以消弱其整体实力。但是，西方却发生了新事变，而且一下子变换了旧世界的面目。

伊斯兰帝国（Empire Islamique）在阿拉伯诞生，风驰电掣地迅速扩展，不仅展向西方，同时也展向东方。波斯王国之力抗罗马与突厥的同时进攻，已经历时很久，现在于伊斯兰帝国突击威力下，陷于破毁了。阿拉伯人不仅占领了伊朗本部，同时奄有了突厥人繁殖极盛的河中府。当地人民，于武力胁迫之后，皈依了伊斯兰教。

新的宗教帝国处在近邻，便对突厥人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结果。波斯人资以抗拒东方而筑成的种族屏障，现在失陷了，而乌拉、阿尔泰的血统便如波涛似的以和平手段倾注于旧亚细亚。高擎穆罕默德的旗帜——在这个旗影下，只要接受这个先知者的教义就可成为主宰者——以征服世界的企图，进到富有的西方与繁华的罗马的希冀，在这个感觉其东方荒原的祖国日形狭隘的人们心中，未始不发生了作用。几十年后，突厥的雇庸兵已经称雄于巴格达（Bagdad）城中，即伊斯兰帝国的都会。当地人民极力诉苦，因为这些半野蛮人经常放肆地招摇街上，无法无天地蹂躏?民和店肆。

由是，在伊斯兰教之下，乌拉、阿尔泰系的居民显著地发展了。现在染上了上亚细亚的血统，不仅为俄罗斯南部与西伯利亚之一部，而旧亚细亚也在其中。从另一方面说，许多部落皈依伊斯兰教，结果使种族分裂成为两个对敌的营垒。俄罗斯南部荒原的游牧民族信奉穆罕默德的教义，正因为如此，他们失去其了与上亚细亚祖国的关系。突厥人由来对于宗教不甚重视，对于教义是完全无置可否，长成于自由放任之中，而为他们祖国东部的一种原始宗教的信徒，现在于西方同皈依的日耳曼人一样，变成了新信仰的护道者，就如儿童似的那么驯服。不久以后，他们成为伊斯兰帝国的雇佣兵，并且为外族的教旨而牺牲他们的鲜血。

后来，当成吉思汗于凭藉匈人的神话和突厥国家的组织之下，企图使民族重新汇合起来的时候，宗教问题便成为他的最大障碍。蒙古

的全部政策须集中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因此产生了一番惨酷的宗教战争，而在民族意识不曾压倒宗教理想之前，种族却失掉无数宝贵的血了。最后分析起来，蒙古的意想所以终归失败者，便是基于伊斯兰在信仰与种族之间挖掘了一道不可超越的鸿构。宗教的裂痕，未始不是危机重重，现在就增加在亚细亚地理的裂痕上了。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6)

七世纪的兴亡变化，还产生了其他的后果。在过去若干世纪中东方与西方所连结的政治和商业的一切关系，现在一下子断绝了。不问是非，仇视世界贸易，顽固地封闭它的边界，而将政治舆图改成为一个各邦联合的镶嵌图案，伊斯兰便安处于欧罗巴与亚细亚之间了。沟通俄罗斯南部的乌拉、阿尔泰游牧各民族的天然桥梁，同时也断绝了。

在其后几个世纪中，中央王朝同上亚细亚的斗争续演不辍。来自北方的危险，像一种恶魔似的压迫了中央王朝。唯有使用挑唆、暗算、贿赂的精巧政策，才可使中央王朝还能免于危害她的恶运。中央王朝皇帝往往向其北方邻人纳币，以求边境的安宁。挑动某一部落以攻击其他部落的老法，始终是有效的。然而这个方法要使中央王朝人供给军械与金钱，且降格而作了与游牧民族联盟的行为，这就造成了一种新的危机。“野蛮人”便跑到中央王朝学习；他们到中央王朝越来越多，而他们所学到的是远在汉人愿望之上。这个广大而富饶的国家的军事弱点，逐渐暴露于他们眼中。后来，他们不仅想做中央王朝的嘉宾，而要做主人翁，这个企望是逐年剧烈。到最后，中央王朝分裂为两三个政府，导致了各皇帝藉游牧民族的援助而自相斗争。各种事变的发展，恰恰如旧罗马帝国所遭遇的一样，后者曾召日耳曼人来帮助——而后来日耳曼人便反客为主了。

终于有一天，产生了无可避免的事情。“野蛮人”攘奢皇冕，而任何人都无法阻其坐于天子宝座上。在十世纪，常常应召来援的满洲部落契丹，占领了中华帝国的北半壁。他们建立了辽国，其统治所及，则自满洲以迄河南省南部。

“野蛮人”入主中原，这确实不是第一次。一直到这个时候，只要经过了几代，就可使新主人翁完全汉化，或使之陷于随后容易扫除的那么疲弱程度。然而，这一次，中原王朝却无喘息的余地。游牧民族

的鲜血不断地从上亚细亚倾泻下来，北方各部落发生了骚动，他们为逐鹿中原而自相攻击，而不耐烦的等候他们的时代降临。

在十二世纪初期，南宋王朝召来东胡系女真人以抵抗契丹。但是，这等于“前门拒虎，后户进狼”，新同盟者固然赶走了契丹，但当契丹刚刚向西北方匿迹的时候，女真人便实际上占居了中国北部，而建立了金国。南宋皇帝只得任其所为而已。

在十一世纪与十二世纪时期，上亚细亚躁动愈形愈烈。整个种族在向南进发，纵然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共同利益的自觉心。各部落不断从原住地向外移动，不停地穿行于广大地面，从青藏高原、帕米尔以至日本海。唐兀忒（党项族的一支——译者注）向东扩展到了黄河上流。前曾建基于中国北部的契丹，突然出现于伊斯兰帝国的边界，在锡尔河上，并建立了一个新王国。在西戈壁里，由那些耶稣教徒领袖的指导，建立了一个游牧民族的大国；这便是那有名的“若望神甫（Pretre Jean）”的王国，其名望远播欧洲，且受聂思脱里教派（即景教）的修士所感化。蒙古高原的北部空前活跃起来。因此，上亚细亚的人民不断增加，且聚集于边界上。然而，那些边界的防卫，是从来没有那么薄弱的。此时的中央王国日趋于分崩离析，她的半壁山河已经被人占去了。在旧亚细亚方面，做了阿拉伯奴隶的突厥庸兵，曾产生过塞勒术克（Seidjoucides）王朝，这个朝代曾在伊斯兰的舆图里成为真正的主人翁；他们坐在苏丹（Sultan）的宝座上，并对巴格达的哈里发（Calife）——他们正式的宗主——发号施令。

各种条件都成熟了，只等候一个人物降临，以重建匈族与突厥的事业，重擎阿提拉的五条黑马尾的“苏鲁德”，并以领导再兴的部族尽力走上那些伟大先人所走过的路。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1)

约在十二世纪末年，这次是从北戈壁向上亚细亚一切游牧民族，举凡有血统、风俗及共同的过去历史之关系的，发出了集结号。蒙古高原北部这个地方是产生乌拉、阿尔泰系民族新运动最理想的所在。因为它确实是上亚细亚的核心和乌拉、阿尔泰系种族的神圣故乡。这是一个崎岖而空旷的核心和一个神秘的土地，而得天然在四面遍设了铁甲的屏障。积雪的兴安岭与阿尔泰山围护在其东西两面；在北面，群山环绕，直至西伯利亚的冰原；在南面，戈壁沙漠构成了一个可怕的天堑。

凭着这种孤立的地位，外蒙古几乎未曾受到外来的影响，并保持游牧民族的精神及其生活形态到了最纯净的程度。无论是中原汉地的精致文化，或伊斯兰的适合一切天然条件的理想，都不能在外蒙古发生太大的作用。对外封锁，周围神秘，神圣群山的白巅矗立于库伦附近；斡难河（Onon）和怯绿连河（Kéroulan）都发源于此，这两条河流后来便以成吉思汗的头几次战仗和头几次集会而闻名了。在这些河流各地，这些山上，这些密林，以及这些荒原里，无论在何时候，自由总是最剧烈的意识。即于六世纪处在突厥民族的统治下，这个地域仍然能够保持着某一种自主权。

至少在公元头一千年中，蒙古是上亚细亚牧地足以养活许多人民的唯一区域。这个地方属于北方典型的地域，在那里，人类仍然能够发展，而不至有因气候过于温和及物产过于丰富而陷于颓废的危险。在这一类地区内，才生存着最强悍的种族。

外蒙古的生活条件是极其酷苦的；唯有像铁一般构造的人类，才能抵抗这种生活条件。不分昼夜，不断地括着亚细亚的暴风。任何海洋都无从以其潮湿来调节这种狂风的酷烈，这种风的狂暴恰像一切大陆风一样。最恶劣的飓风来自北方。它卷入贝加尔的积冰面层，侵入

山地的森林，绞断了或打折了松树、枫树的华盖，而且扫荡茫无涯际的荒原和亚细亚腹地的沙漠，而其风势始终不曾稍减。

史前，蒙古曾为一个大海所充溢；戈壁的咸水湖便是海的余迹。在第三纪地质时代末期，当原始的人类出现的时候，这个海已经干涸了；可是，土地与茂林的一种强烈的潮湿，曾使当地气候为之温和。直至有史时代为止，亚细亚中部的气候条件，应比今日所见的优良得多。沙漠则不断地扩展。像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老惨剧在这里周而复始地演出：荒原侵吞了森林，而沙漠侵吞了荒原。强有力而愈陷愈深的沙，对于所资以为生的面积不断缩小的人们，只能任其选择屈服与逃亡，或为尺寸的土地而奋斗。

蒙古的居民不是从事农业的。不像农耕民族凭藉锄、铲、水道、水闸以防卫被压迫的地方，这种办法是他们所鄙视的。他们宁愿屈服于沙砾之前，过着其故土极见狭小的掠夺的生活。他们向外移动，以寻见新的牧地。眼看他们的草地为沙所掩而不为所动，他们却变成了地球上最能向外发展的和最能作战的民族。土地所赋予他们的愈啬吝，游牧民族愈努力向其他空间发展。

远离海洋实是蒙古的不幸。那些河流，经过短短的行程后，就一大部分在荒原中干涸了，因为蒸发的力量是远比年中雨量剧烈。在这个地区的北部，有如贝加尔的大盆地可处于海洋的地位。但物产最丰富的所在，并不是这个地方。贝加尔湖淹盖了同瑞士一样大的面积，并有与亚得里亚海几乎相等的长度。除此之外，这个湖泊丝毫不像其在欧洲处境较优的同类。环绕贝加尔湖四周的山峰，终年积雪不消，而在半年中，它的水面冻结极其结实，俄国人有一次竟然能够在冰面上铺设一条铁道。湖里的暴风浓雾，使渔人视为畏途，因而使人误认为其为魔窟。

山岭也不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在山谷里，藏匿着泉源和池泊，它们的水面发出一种酷烈的硫磺气味。不毛的高峰遍布着不连接的岩石，它们堆成了不整齐的棱椎形状。风吹到这些乱石堆里的时候，便

生出一种雷击的空响。有时，一堆石头崩塌，压死了人，并将群熊从洞穴里赶出来。许多奇形怪状的岩石，很像打铁砧石的形态，散布在高原各处。当地人民叫这种石头为“成吉思汗的磨石”。因为他们说这个蒙古伟人自己曾在那上面磨砺军队的箭镞和刀剑。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2)

往南逐渐过渡，山脚下伸展着一片荒原，其先还散布着树林和山冈，再往后去，则地面潮湿而平坦。树木不生，路径无有，四围无阻，一望无穷，这个荒原便引人作流连忘返的驰骋。黑色而作尖形的游牧人篷帐散布在地面上，有的独自孤立，有的集聚一处。整群的牛、羊、骆驼缓步吃草，整群的马疾驰而过。再向南去，丰饶的牧场变成了盐质的荒原，再过去，就是真正的沙漠：戈壁由此开始了。

这个高度的沙漠，有的地方是盐质沙漠，在海拔一千米及一千米以上。像一条长带似的，从西南伸展到东北，切断了外蒙古与内蒙古，且由此切断了亚细亚北部与中国。前往北京的商队，须在库伦与张家口之间，度过这个可怖的地方。在前进当中，骆驼备尝了饥渴，因为在戈壁沙漠里可以说无从找到草料，而水料几乎全是碱质而不可喝的。稀有的甜水源，则是常常冻结了。

在它的魔鬼蛊弄之下，这个鬼蜮地方缠人至数星期之久，而往往不使之得脱。蒙古各城堡里的白骨及其淹埋于沙中的残迹，都足以证明过去的惨剧。黑色的圆锥形山岭矗立在天空中；它们的侧面像磨光的云母石似的闪耀着。许多光耀的石头，遮盖着深暗色的沙砾：那是玛瑙质暗色云石、白玉石、红玉石。这儿一块、那儿一块，到处闪耀着晒干的盐泊，通通白亮的。

在这个戈壁地方，黄沙白雪，旋飞天空，寒冷的骤雨将地面变成盐水洼，人畜都可能淹没在那里面。魑魅魍魉，会作人声，昏夜里诱致商旅，使之迷途失道，人们因而彼此告诫，必须燃火走路，且须携带术士同行。

戈壁，它又是：蒙古军队同中原王朝对抗的集中地。当他们的骑士，饥渴得半生不死，终于达到了沙漠南境时候，在他们贪婪的眼中出现着一个人间天堂，山青水绿，可爱而丰饶，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穷的宝藏。

蒙古气候像它的景物一样的酷苦。一月中的平均气温为零下三十度，这与格陵兰（Grceniand）的等温线相符。然而，在七月中，平均温度为二十五度至三十度，实与非洲的情形相仿佛。四时的气候就是这样相去甚远。

夏天是酷暑而干燥，往往起了害人的暴雨，其中雨水并不多，但却引来括沙的飓风。在这时候，沙土穿透一切衣服，钻入皮肤毛孔里。每次呼吸都成为一种苦事。在好几个小时中，不见天日，白昼变成昏夜，方向无从辨别了。

在八月中，秋季已经开始，降了夜霜与寒冷的骤雨，在这个尚可忍受而为期短促的秋季过去后，冬季来到了。那是西伯利亚可怖的严冬。

空气是一种如刀裂的寒气，而且非常的干，使皮肤龟裂，有如受鞭打的感觉。可怖的暴风雪之后，继之以暴风沙的酷烈。在几分钟之间，凡是超出地面的高地、人、畜，都披上了一层凝冰。途中行人，在五步之外，就看不见东西，而且冒着受暴风雪所窒塞的历久不断的危险。所以在西伯利亚各城市里，到冬季，逐户结着一条绳，预备在起暴风的时候，人们可以按着绳子向前走；往往有人在离自己家不过几尺的地方，总不能达到，而死在那里。游牧人们说在这种暴风里，马会变疯，他们将这种暴风唤作“马昏风”，同时也唤作“黑风”。

对于不是当地生长而不习惯的人，这个地方简直是一个地狱，它只有一个愉快的季节在短促光阴中过去：春天。到了春天，太阳射出来，气候和煦，暴风停止，流泉解冻而重新流淌于林中。整个荒原变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花海。“开花的草地”是游牧民族语言中的最美丽的字眼，固然他们语言少有可以入时的表情语。凡是可爱的东西，他们都唤作“开花的草地”：他们的英雄，他们的良马，他们的身穿华服的少女。春天荒原的花卉，同时也是上亚细亚一切毛毯生产的永不磨灭的图案。每年年份开始于草地开花的时候。若干原始民族不以日月来计算时日，但仅根据春天来计算。有人要说出他的岁数，就说：“从

我出生以来，草地曾开花若干度了。”因为，在他们可怜的人生中这是唯一的重要事件。当草地开花的时候，各处帐幕都向太阳大大的开放，母牛生子，马则恢复雄姿。从开花的草地，各部落又出发了，或从事上山放牧，或从事新的战争。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3)

帐幕和马背，便是游牧人的故乡，因为，按蒙古的俗谚说：“人生于帐下，死于马上。”这种毡制的帐幕，名为“蒙古包”，黑色而作六角形，用木架支撑着，可于半小时之中拆下，装上一辆牛车里运走。里面的家具是很简单的，几张皮套的木凳，一个贮藏几件有价值的东西和女人宴会华服的木箱，几尊神像，以及烹饪用具。

牲畜为游牧人唯一的财富，他们生存的需要都取资于此。牲畜的皮毛供作衣服、被毯及蒙古包建造材料之用。皮是用以制造铠甲、盾、鞋、餐具。骨和筋则用以制造种种器具，并作制造军械之用；兽粪是最好的燃料，因为在荒原里柴是很昂贵的。他们的食料几乎全部是动物。蒙古人说：“草是供给牲畜的，牲畜是供给人的。”至于兽肉的数量，他们并不难得到来源。他们也吃有病的或甚至于坏的牲畜，并不怕食狗、猫、老鼠。只要是兽肉，都可以食！不管它是生的或熟的，是晒干的或煮的。他们用手吃东西，用刀在口边切肉。他们将油腻渍满的手揩在靴子上，因使靴子老是新揩油过的。

蒙古各民族将牛奶酪煮过，向太阳晒干，制成了一种坚硬而可久存的食品；仿佛与欧洲的牛酪饼相似；在旅行中，他们携带这种干粮，将它溶化在水或茶里面，可以迅速地改成一种滋养的食料。酸的马奶可制成一种可醉人的东西，名为“库蜜斯”（Koumis）。少许的黍和野蒜，几是他们唯一的蔬菜。

皮衣是贴身穿着，按照季节，或正穿，或反穿。冬季，他们往往套着两件皮衣。妇女的衣服几乎完全同男人的衣服一样。毡制的帽子，高而作三角形，是用一条打结的布作帽纽，系在颌下。笨重的皮靴，前头是尖的；走长路是不方便，而在骑马的时候，它则有绝好的效用。

因为一切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在马鞍上生活。在这个产马的地方，没有人步行出门，即使是最穷苦的人。马的数量之多与其品

质之良，是蒙古人所最引以为傲的。王公们往往拥有十万匹以上的马群，他们要使其毛色一律。马的身段，普通是很小，而不足以眩人，但它却是非常富有抵抗力，背脊丰厚，习于一切困苦。在游牧民族的神话和故事里，马所居的地位，至少也有人所居的地位那么重要。

男人只管战争和狩猎。狩猎便是战争的准备，并可代替战争，而狩猎的行动，召集各部落一致参加，就像出发作战的行动一样。若有一人不能随众出发以杀人或杀兽，他就懒昏昏的踯躅在蒙古包里，沉醉于“库蜜斯”，如果他有力量，也沉醉于烧酒。

牲畜为不拘何物、不拘何人的钱币本位。同样，按照他的用处大小，可视同一匹马，或一头骆驼，或一头小牛。人的价值是以其用处大小为标准。如果在战争中，掳来的人是太多过于牲畜，则无用的人便被屠杀了。其余的人，妇女及工匠，则像一群牲畜似的，被赶在前面走。在这个民族的道德观中，淡泊主义与功利主义处于颠倒地位。蒙古人的质朴是自然的质朴。凡是有利者都是好的，凡是有害者都是坏的。人们想从为生活而斗争的酷烈的定律里推演出一种伦理来，则不能选到比这个更好的榜样了。对朋友的忠诚是必需的和应遵守的，同样，对敌人的狡诈也应如此，对着敌人，则最神圣的誓约也无遵守的必要了。到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指导众志向唯一的目标前进，上述那一点便可使这个民族强过一切敌人了。社会所强制加于个人身上的各种联系和各种限制，只有在共同行动上明显的表现其所呈献的利益，才能得到他们的承认。理想降低至严格必需的程度。从来没有达到实际需要的一种动作或一尊神圣偶像，能够活动于蒙古人心目与实际之间。

在这种情形上，他们并不表现一种非常的行为。他们的性格乃是游牧生活所要求及所资以形成的性格。一个原始的社会，需要原始的人和一种原始的道德观。到后来，他们钻进了文明的复杂迷宫而且加入了那里面后，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道德观同时都发生变化了。他们变成善良、软弱、敬神、诚实的人了。他们将理想混作实际；格言混

作本能，天混作地。像他们那种天真的本性，事实上不能一跳便跳过几千年，因此他们失掉了原本的生活方式，从最强的一变而成为最弱的了。在战场上，他们压倒了其他一切民族。然而，一到了他们同最文明的民族并坐赌输的时候，他们已经处在下风，因为他们就没有赌输的方法。的确，要遵守那些方法，同时又不要失其眼力的优势，则应具有文明人的一切败德和虚伪。当蒙古人说假话的时候，他们是说假话，他们说真话的时候，确能看出是说真话。同时说真话又说假话，同时注意天又注意地，以牺牲为下注，这种技术，他们不能在那么短促时期中一一学到。

蒙古人曾在几十年的过程中，跳过了半原始的幼稚时代与尽美尽善的亚细亚文化彼此相隔离的阶段。在世界文化史上，这一种迁徙事实及其达到的结果，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同自然发生实利关系到了那步田地的人们，不懂得宗教的运用。他们认为来生不过是今世的继续。所以他们对于死人，供给了食物，装鞍的马匹，日用器具的仿造品，甚至于死人的妻子，一一都埋在地下。他们心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最尊神圣，但他们只向他请求平安与长生。家神是应可满足日常生活的各种琐事的，这些家神互相嫁娶，生育子女，每顿饭中，他们也有份，即将食物磨擦他们嘴上。

帐幕中的共同生活，往往包含一个在父亲支配下的家庭，代表着民族的社会结构里的组织单位。王公们计算他们臣民的数目，不是根据每一个人，而是根据每一个帐幕，各个帐幕再合起来而构成了部落集团。妇女担任着照顾家庭和牲畜的工作，她们是居于相对崇高并受人尊重的地位。多妻制是一般盛行的制度；但是，在产业与继承的问题上，第一名的妻子则居于第一列，她的儿子也享受同样的权利。大家庭的集体情绪可由下述事实最奇特地表现出来，即在父亲死后，儿子们可娶父亲的妻子为妻——他们的生母除外。同样，兄弟可娶寡嫂寡娣为妻。部落中的妇人及少女是不可侵犯的，性道德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反之，敌人的妻女是无阻碍的，必须成为威服的对象。

继统的王公，即号为“汗”，是部落的首领，但是，他们对人民负责，往往因为他们不曾充分的以物质利益供给臣下，而被人驱逐或杀死。君主国约束那许多贵族的对立以及他们的旁系血统——因为在蒙古最富有者有最多儿子，并防其私自更换。在蒙古，没有像中原王朝那样的所谓“天眷”或“皇统”的踪迹。对国家，像对个人一样，是以妥善的行为以达到支配行动的目标为原则。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4)

关于他们的源流，蒙古各部落自述如下。

约在成吉思汗前二千年，经过一次残酷的战争后，人民全部被歼灭了。只剩下一男一女；他们逃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山谷里，那里群山环抱，高耸如天。他们在那里避难，犹如世外桃源，且生了许多子女。经过许多世纪后，他们的子孙繁衍不息，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部落。最终，山谷变得日益窄狭，不够养人，而牲畜也缺乏牧场。于是，这个部落人众决定回到他们的祖先生活过的荒原。

但是，他们不能找到先人从前来此的踪迹，而且他们多方探索，一切都徒劳无功。狭窄的山谷便变成了一座牢狱，在那里，人畜都将濒于绝境。

有一天，人们发觉围绕他们的高山里层完全是铁。于是，他们砍下了山谷里的森林，将木头堆在岩石旁边。他们燃火烧了这个木堆，并用风箱来煽动火势。火光冲到霄汉，不久生出一番很大的热气，竟使整座山变得通红通红的。他们不停地搬木头来，拉动风箱煽火。山上的铁终于熔化了。熔解的铁，不断地向外流出，岩壁裂开了，而倾注于荒原里。人们便从裂口里闯出来。跟着熔解的铁，他们越过了高山恢复了自由，驰骋于漠北高原上，逐渐成了那里的主人。

这是一个善战的和骁勇的民族，他们用这种方式描绘自己的历史。可是，这个传说，尽管在寓意的力量上是无与伦比的，而究其实，却无非是过去的实际情事的偶像化、诗体化而已。“锻铁者之民族”的传说——其实，上亚细亚的一切突厥系各民族都自命为这个民族的后人——乃与初期史中所发生的大事变有了关系。

在匈奴大国还未建立之前，在中央亚细亚，曾有若干次重大的冲突，发生于乌拉、阿尔泰种族与另一个种族之间，后者或许就是向东方进展的印度雅里安种族。那些来自西方的各种民族，曾将蒙古人的先世赶到丛山里。但是，在同一个时候，他们随身带来了一种重要的

发现：采铁的技术。他们的军器，即用了这个更坚利的新金属质制成的，起初曾使他们打败了各游牧民族。乌拉、阿尔泰系各族因此被压碎了，而其残余则逃往深山穷谷。后来，这些部族也学会了采掘铁矿与冶铁的本领，他们由是能再同包围他们的敌人斗争了。

冶铁技术的出现，在东亚细亚，像在其他各地一样，使这里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山岩熔解的传说，便是这个变化的象征。铁在乌拉、阿尔泰系民族的历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可由游牧民族的对这个金属物的宗教崇拜里表现出来匈奴人确确实实地崇拜这个东西，而成吉思汗，也像在他之前的突厥大帝国的可汗一样，被崇奉为“民族的锻铁者”。可是，这个名词的意义在那里远远超过我们欧洲人理解的范围。

在十二世纪，冶铁术在蒙古几乎陷于完全停顿的状态。铁是那样的稀少，只有王公们方才可以用铁作马镫。已存的数量不够应付枪箭尖锋所必需的数目。中原统治者严禁将铁输往蒙古——他们很知道其中的理由。到了中原使用铁辅币后，蒙古才能藉走私方法运入了大量的铁。可是，这仍不够应付需要。同时，西亚细亚兵器的输入，特别是大马士革（Damas）的那么被重视的利刃，是几乎完全陷于停顿：伊斯兰各国的政治混乱局面使商业陷于萎顿。而游牧人民将用什么代价来偿付这种贵重的商品呢？

阿尔泰山各山脉及贝加尔湖区域确实蕴藏了丰富的矿脉——在那里，我们可看出过去开采的无数遗迹。然而，在十二世纪中叶，开采的工作停顿了。停顿的原因是因为在那时候，在戈壁与贝加尔湖之间发生了骇人的无政府状态。游牧各民族分散为无数的部落，不断地彼此争斗；生活程度和文化水准都大大降低了。

这是游牧各部落的一个苦楚时期。蒙古四方八面为强邻所围，这些部落或国家深晓守护各自的疆界，以抗御饥饿的草原各部落人民。大金帝国包围了蒙古的东面和南面，它本身是由从前游牧出身的民族统治着并拥有一支坚强的军队，对于任何侵犯其边界的企图，这支军

队便以残忍的手段予以惩创。在蒙古的西南面，唐兀忒人建立了汉藏杂居的西夏国。最后一个在蒙古的西面，这就是契丹，他们自从退出中原以后，建立了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西辽国，她的势力范围是从阿尔泰山达到锡尔河，与许多伊斯兰国家接壤。

蒙古各部落的力量远不及这一切的敌人，至少在他们各部落仍处于涣散的状态中。因此，团结行动的展望可能性是很小的。草地不敷分配，而在境外又毫无办法可想，这时候，他们怎能不自相争夺呢？这些游牧民族，处处失其行动上的自由，不断地自相残杀。他们必需向外迁徙。但是，为求向外拓展生存空间，他们必需打仗。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因为打仗而移动，因为打仗是他们的常态和生活的意义。战争无非是表现着那些游牧民族的通常经济形态，而他们却视和平为一种恐慌的状态。所以乌拉?阿尔泰系的某些种游牧部落的语言中，就用同样的术语，来表现“迁徙”和“刀砍”的意义。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5)

所有各部落人民的梦想，就在于取得良好的报酬下，替汉地的两个皇帝之一，或北朝之金，或南朝之宋，从军打仗。他们的王公，无力驾驭的饥饿的游牧人民，也向需要他们的方面投效。然而，汉地对于救兵的需要，不是无限制的，而且经过最后数世纪的经验后，她宁可不要以这种野蛮人当做嘉宾看待。

由是，游牧民族除在自己的地方战争外，再无其他途径可走了。这就成了一种悲惨的战争和一种悲惨的生活。为了几亩的青草地，为了一条泉源，一对母牛，或一块受人爱惜的丝绸，或许简简单单的只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或为了不愿任兵器完全长锈，人们打破了头颅。

在十二世纪中叶，当成吉思汗——这个终于打开了监狱门户的游牧民族领导者——诞生的时候，在蒙古高原上，驰骋着许许多多的游牧部落。唯有在南部，才存在着一个游牧部落的大联盟，它统治了荒原，从阿尔泰山东面直到戈壁。克烈部（Kérait）可汗做了这个大联盟的领袖。这个人物的盛名曾远播欧洲，他是以“若望神父”的名字为欧洲人所认识。他或许同其游牧部落皈依了聂思脱里派的耶稣教。这一支教派，在前几世纪因为发生分裂而与罗马教廷脱离，遭到了罗马的驱逐，并被摒于教外，于是改向东方发展。在中央亚细亚与东亚，聂思脱里派拥有为数众多的教徒，单以中国来说，它拥有了一千以上的教堂。不过，随时间的演变，它的耶稣教义曾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突厥系的乃蛮（Naiman）部和畏兀儿（Ouigour）部都位于克烈部之西；他们已经称臣于西辽的契丹。畏兀儿部是文化相对发达的民族，他们以其别失八里（Bich-balik）的都城与塔里木河（Tarim）的上游盆地，掌握了通达西方的贸易专利。

此时的蒙古高原的东北部，已经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蔑儿乞惕（Merkit）部居于贝加尔湖，再往北去，乞儿吉思（Kirghiz）部还居

在那里。在东端，当兴安岭的斜坡及在现在的中国黑龙江流域附近，还有塔塔儿部的牧地。“蒙兀儿”小部落的故土，就在蔑儿乞惕部和塔塔儿部之间。他们的势力中心点大概位于现代库伦城的附近。周围的山岭，斡难河和怯绿连河河源的区域，是驰骋于蒙古之一切部落的民族发祥地。

成吉思汗便是诞生在这些神圣的山中。

第四章　草原上的锻炼者(1)

也速该 (Issougéi)，蒙古一个小部落的头领，死于一一七五年。他遗下了一个寡妇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他的儿子铁木真（Témoudjin），在失去父亲的时候，年仅十三岁。后来，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成吉思汗。

在我们看来，即使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也速该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毫无名望的部落首领。然而，在蒙古，在他的伴侣们当中，他总享有某种盛名并握有某种势力。他属于那些最古老的一个没落王公家族的支脉，而他的祖先们，曾自命为那个著名的“苍狼”的后人，在游牧部落的历史中，他们已经在戈壁北部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关于蒙古帝国灵异不凡的来历，有一篇古老的传说叙述如下。

也速该有一个祖先，离家出征两年后，有一天回到家里，发觉他的妻子依然怀孕。在他怀疑其妻的明显不贞行为之下，他的妻子便述说了下面这段动人的往事予以解释：

“有一天夜里，我正躺在帐中，还未睡着，有一道光芒从天窗射进来——这必然是一颗星星发出来的光芒。它化成了一个黄发碧眼的少年，而连几次摸触我的双乳。从这个时候起，我便发现怀孕了。”

这就是蒙古皇室的神秘来历的叙述，这一类叙述及复见于亚细亚各皇朝的许多神话与传说里，圣经里也可找到它的踪迹。

大家能够不惊异这一个英雄的世系是来自这一类的血统吗？因此，也速该的祖父便被蒙古人尊奉为民族英雄；在各蒙古包里，各篷帐的篝火边，大家傲然自得地讲述着这个大可汗的历史，他是那样勇敢，竟敢拉了金朝至尊至大的皇帝的胡须，不受惩罚。

这一番英雄举动的经过，实际如下。也速该的祖父，恰如他那一时的蒙古王公一样，不过是一个为要维持生计，不得不替外族效劳来赚钱。接受了报酬，他就率其部众为金朝皇帝打仗。打了胜仗后，金朝在中都开了一次盛大的庆功宴。在这次宴会中，也速该的祖父不但

饱吃了一顿，而且狂醉无度。他在这种状态下，并于朝臣惊骇中，竟然上前捋了皇帝的须。皇帝宽怀大度，不以这种冒犯为意。这个蒙古人便满载厚赐和盛名而归，而其惊人的行为——他也知道善于利用——便大大地增加了他在游牧民族中的威望。

他的孙子也速该，即成吉思汗之父，也因替金国皇帝出力而饱获利益。他知道设法应付各强邻，并能一度集合二万人于旗下。这个游牧民族部落首领甚至能同戈壁的强主克烈部可汗歃血结盟；他们刺血流入杯中，和上酒，庄严地一饮而尽。

如上所述，也速该曾尽力以图改善其家族及其部落的境遇。然而，他的早死便使他生前一切努力成为泡影，而其建立的很好的政治基业立即崩坏了。历来，蒙古人已经难于抗拒其强悍的邻人，以保护其珍贵的牧地。在这种情形下，也速该的寡妇及其诸幼儿，能有什么可以献于那些邻人呢？在族人看来，利有轻重，对故主的忠心，遇到无利可图的时候，就失其重量了。也速该死了，他的部众逃走的逃走，脱离的脱离，而依附于另一支较为强大的旁系，同时，他们带走了也速该的牲畜。

诃额仑（Iloum，元史称为宣懿皇后，铁木真的生母），死者的寡妇，现在完全处于绝望的境地了。失去了牲畜，她和几个孩子便陷于饥馁之地；失去了武装的人，她便身临荒原中一切危险。然而，诃额仑是一个勇敢的女子。她不费踟蹰，跨上也速该的战马——人们留给她的唯一东西，而追逐逃走的族人。她痛斥他们，痛哭，哀求，唤起男人应有光明正大的精神，追诉她丈夫的的功绩。结果，有一些人受了感动，带着一部分牲畜回来了。

最可怖的危险离开了。现在他们总有吃的东西，总可防御荒原的无赖。可是，保持几个孩子的生命，这个希望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敌人们清楚地知道：也速该的儿子在世一日，就一日不会放弃其做本部酋长的合法要求。他会与他们势不两立的。追索小小铁木真的残酷行动开始了。

所以，在那时候，这个年轻人已经处在全体利益的中心，且习于拼命斗争的目标。他对于本身价值的认识一天大似一天。人们历来不是怕强者撵强者吗？在他这一类血统的后人身上，一个非常的命运不是保留着吗？当他诞生时，他手里握了一块凝血：他母亲曾对他这么讲过。而且，他想到那个苍狼，想到他祖先的始母的怀胎不凡，想到他曾祖父及他父亲的伟业，而他永是处于致命的危险中。这个小孩子的心中逐渐萌生了广大前途的理想。

不久后，他不想再做斗争的客体，而要做斗争的主体。他取得了小部落的领导权。而在事实上说，人们都屈服于这个孩子的意志下。诃额仑，以其做母亲的直觉，承认了其长子的惊人的天才。他的诸兄弟，要看出这个天才的明征，结果他们也感觉到他体力的优越。不久后，他在部落的青年中，找到乐为他效死的朋友。他们无条件地服?他，恰如心地光明的青年之服从天生的豪杰一样。

在这个年轻的铁木真身上，长出了一种惊人的本色。他相貌奇伟，引人注目。铁木真的体格及其力气，远在常人之上，他具有一个堂皇的高额。他的双目炯炯，没有其他蒙古人眼睛那么大；他头发的红光和他脸色的淡白，都引起时人的注目。没有一个人不看到他身上的天然华贵。他心中的安定，从来没有失掉，即使在危险与最屈辱的境遇中，这实在使人为之感动。

以这种种的特质，在这个时期中，成吉思汗的生活可算为高级王子的生活，是很勉强说得上的，而他所从事的斗争也毫无伟大和“罗曼提克”的表现。实际他和他的伙伴们，那时还过着着漂泊不定的生涯。

有一天，他的小部落中所有的马——全数还不到十来匹——被人偷走了。留在铁木真手里的，只有一匹老矮马，而在追贼途中，这匹马不久就倒地死了。现在，这个蒙古王子只能两腿跑路了！两腿跑路，而在这个地方，讨饭的都有马骑呢！他再不能堕落得更低了。可是，铁木真遇到了一个青年，也像他一样，还在小小的年纪。他教这个青年从其父亲的牧场里悄悄地偷了两匹马，两个人一道追下去。这

一行动成功了。铁木真不但找回他的马，这个少年也成了他终身不离的一个伴侣(此人名孛斡儿出，纳忽伯颜之子)。

又有一次，铁木真落于他的死敌手里。他便被人用蒙古法拖着走：一个重木枷架在他的脖子上。可是，铁木真奋击他的守护人，以项上的木枷打破了守护人的脑袋。他逃走后，跳入一个湖泊里，几乎被淹死，因为那个重木枷妨碍他泅水。有一个蒙古人把他救起，把他藏在草车里。追兵怀疑铁木真藏在车上，其中一个士兵持枪刺入车上的草里，而铁木真却奇迹般地安全脱险了。

十七岁那年，铁木真结婚了。那个少女，名叫孛儿帖（Bordou），是其父也速该在世及其家族还在全盛时代定下来的。在这前前后几年中，铁木真变为一个穷小子，而他的生命还比不上一条羊尾巴。然而，孛儿帖的父亲，是近邻一个大部落的酋长，仍守原议，不仅是因为他答应了也速该，更因为他看重小铁木真的身份和显露出来的锋芒。

不久以后，一团黑云降临在这对年轻夫妇身上。他们婚后不久，有一次，当铁木真外出的时候，孛儿帖突然被蔑儿乞惕部掳去了。等铁木真回来，自己的蒙古包已经空空如也。他心里明白，当一个少妇落在敌人手里后，那将遇到怎样的境遇。

第四章　草原上的锻炼者(2)

铁木真明白自己的实力，他强烈地忍耐着。一旦他有了能力，他立即出发进攻蔑儿乞惕部，把他的年轻妻子从敌人手里抢回来。

孛儿帖被救回之后，铁木真发觉妻子怀孕了(蔑儿气惕部为报也速该夺了赤列都妻子诃额仑的旧怨，率众袭击铁木真，结果夺了孛儿帖。配与赤列都之弟为妻。)。在归来的途中，她已于不毛的荒原上生下了一个孩子。铁木真始终不知这个小孩——他的第一个儿子——到底是蒙古帝国的合法储君呢，或者是蔑儿乞惕部的一个私生子呢。前者与后者，是同样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孛儿帖本人也无从说起。这个小孩被名为术赤（Djoutchi），即“意外生的”之意，他的父亲默忍了这个儿子。然而，关于他来历不明的谣言，后来始终不曾消沉。这便是成吉思汗宗系的惨剧的开始，而其结果却于日后产生了关系世界的重要性。

同孛儿帖的宗族联姻，这对于成吉思汗及其族人可以说起了不可轻忽的作用。从此时开始，铁木真可以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自己及伙伴们的生命可以受到相当程度的保护了。他于是反攻为守，逐步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开始建立起其未来统治的基础。

他的母亲，聪慧的诃额仑，再嫁与一个萨满大教主，这对于后来的发展是极关重要的。无疑，铁木真为国家大计，进行了一系列的联姻。他的继父被人视为有威权的卫士和天神的心腹，不久后，他的名望就使这个新生的部落联盟得到一种宗教的根基。那时已经洞悉自己未来目标所在的铁木真，首先就是使他的政策具有一种正统的源流。在其统一各部落的斗争中，除了必需的武力外，传统的关系和神话都应作为其统治的武器。

对于他所征服的蒙古各部落，他都采取宽容政策，尽量地吸纳到本部中来。但对他本部的贵族被叛者，即当他父亲死时，不顾羞耻而背叛他母亲的人们，就将他们放在大镬里烹，直到他们气断为止。除

此之外，铁木真尽力使内战后的疮痍迅速复原。一种磁力的作用立即映到这个蒙古年轻王子身上。他的英雄行为和他的神秘来历的传说，便迅速地广播于游踪无定的牧人口里。荒原充满着某种非常事件即将降临的寓言，所有一切的游牧人民都受着震动。人们开始回忆当初在匈奴与突厥人领导下的民族统一的时代。

铁木真是很聪明的，直到此时，他总避免根据他父亲当初所订立的盟约求援于克烈部可汗。他不愿意以其弱者的身份向强者求助；如若求助于强者，势必妨害了他的独立与自由行动的地位。他宁愿忍受种种困难，不结外援而与势力比他雄厚的敌人作斗争。

在他征战的最初二十年中，每天都在从事不间断的斗争，以求统治一个幅员偏小的地图。历时数世纪的无政府状态曾将各部落人民造成了极其残忍的性格，各部落变成了一盘散沙，而在无数贵族的家族领导之下，彼此互相猜忌或互相敌视。在这些年中，铁木真以高超战术、坚强的毅力或伟大精神而演出的斗争，进行之难与性质之重要，都不比其后他征服世界的斗争逊色。

他往往在间不容发之间保全生命，因为他历来总是站在最前线。有一天，他项上中了一箭，几因流血过多而死去。幸而他的战友将雪洒在烧得沸热的项上，而用这个原始的止血方法救了他的生命；但是，这个年轻的国王仍然无知觉地躺在雪地里，得了痉挛症，不能够送回去。他的忠实徒伴们因此在整个冰冷的长夜中守护在他身边，撑起个人的长袍掩遮着他，以防暴风的侵袭。他们有一天都得到报酬，而成为世界大汗的勋臣。

在一一八九年，铁木真被东蒙古各部落拥为可汗。但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不足以奋身走入大政治的漩涡中。

五年后，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北中国的金朝与阿尔泰山及贝加尔湖的几个部落之间发生了纠纷，这个金朝对于蒙古地方，至少在名义上行使着一种宗主权。铁木真立即决意站在金朝方面，并向金朝

取得金钱与军器，战争顺利结束后，他便从北京方面得到封号及大批的赏赐。

这一次，铁木真成功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成为到处受爱戴和缔盟的盟友。当克烈部老可汗王罕在一次被其部落叛乱所危害的时候，铁木真抓住了这个机会建议同他结盟，这个时候，他们站在同等的地位了。

王罕以感恩的心情接受了铁木真的建议，因而也速该当初所上演过的刺血为誓的隆重仪式，便于一一九五年再度举行了。这次结盟极大地壮大了铁木真的力量，在数次征伐中，这两个盟友制服了蒙古一大部分的部落。当然，这其中扮演最积极的角色者，乃是铁木真。他鼓动老可汗卷入军事行动的漩涡，并使之为铁木真本人的利益而效劳。他得到了克烈部这位酋长的完全信赖，后来竟使这位酋长有了愿意以这个年轻蒙古人为继子并将他当作继承人看待的打算。老可汗的亲子终不免有所疑虑，他感觉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这两个盟友之间第一次出现裂痕，是在克烈汗在其子鼓动下，不肯付予铁木真以其所应得部分的战利品。但是，因为铁木真还需要克烈部的帮助，他终于没有计较这回事。他们的联盟，虽然常常受到撼动，但还是支持了八年之久。这八年的光阴，铁木真曾善于利用，以巩固他的权力，同时，在克烈部中，结识了许许多多愿意追随的朋友。在一二○二年，当克烈汗作了一番新的不忠实行为后，铁木真听任这个盟好中断，同时，他又以巧计使克烈汗表现其错谬于万目睽睽之中。

到了他已经整军经武之后，他便以下述动人的文字寄给同他刺血为盟的朋友。

“你忘记了吗？”铁木真写道，“正像我父亲救你出了大险一样，我本人也历来援助你。当你投奔到我的地方，你那时是很瘦的，而我则使你又胖起来。从你身上的破布透视你的消瘦身体，正像从云中透视

太阳一样。我便把衣服给你，你重新再做我的父亲吧，让我再做你的儿子。”

然而，从很久以来，他已经一笔勾掉这个旧交谊了。当克烈汗受这个动人的怨语所感动之下，在最后一刹那，想拿出友谊的保证，他就刺出自己身上的几滴血，滴在马乳里，送与铁木真，铁木真则已调动了全部兵力而发动战争了。老可汗被打败了，死于逃亡的途中。克烈部的最大部分，竖起降旗而归顺了铁木真。

铁木真代表的部落联盟，汹涌澎湃地发展着，这引起了那些小部落酋长的忧虑和混乱。他们组织了一个反成吉思汗联盟，西戈壁的强大的乃蛮部也加入其中。可是，铁木真先发制人，在他们未及厉兵秣马之前，已把他们打败了。

从也速该去世之日起，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在铁木真的努力下，也速该的小部落现在成了四方的盟主，而整个蒙古高原几乎将全部归顺于他的旗下。他的部落联盟现在一变而为大强国。然而，为保障这个大强国的生存，有两件事还必须做到：这个新强国应凭一种坚强的国家组织予以支持，并须凭这个组织使之合法化，这无非要使离心力和无政府的倾向失去其实现的存在基础；其次，应以一种新的目标加于那些心性不定而酷嗜行动的部落的联合力量上。这就是说对外征服可以维持和巩固内部的和平。

铁木真于一二○六年秋季召集了的一次部落大会。这次大会，号为“忽里儿台大会”（Kouraltai），召集于蒙古人的发源地——斡难河。在他的家族里有一个神圣人物，其中的好处现在明显地显现出来了。铁木真的继父蒙力克萨满及其儿子阔阔出——也为萨满，都在大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向集合当地的部落百姓宣达长生天的一个重要敕命。铁木真，显然受了上天的眷佑，应统率所有一切的骑士部落，像他已经打败了许多可汗，他应拥有成吉思汗的尊号，即是说“万汗之汗”。

第四章　草原上的锻炼者(3)

经过这个动人的首幕后，铁木真自己说话了，他说：“如果最高大会确实愿意推他为成吉思汗，为表示感激大家的归顺起见，他将以‘蒙古人’这个荣号给予心悦诚服地结盟的各部落。”他接着说道，“蒙古人，我视为像水晶那样结实、纯净、明亮，我将率领他们走到统治世界的道路上。”这次成功的大会，其中包括权利平等的同盟者，都鼓掌欢腾。铁木真从此加上这个尊号了。

这位新受尊崇的成吉思汗，可以满足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了。在其将单独一个部落的名字扩大于所有一切的杂色部落身上，一个新的民族出现了。这样，各部落都降至寻常的家族集团，他们的旧名号仅能以传统的称呼关系而存在着，而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在过去数世纪的流血斗争中，种族曾经完全失掉其统一的心志。现在，以“蒙古人”的身份，成吉思汗可以重新提出统治世界的蓝图。因为，征服世界这件事，不仅是新联盟的目标，而且为其唯一的意义。在斡难河大会中，成吉思汗已将这个意义明白宣布了。他对内的和对外的纲领联系着过去的历史，即在乌拉、阿尔泰系种族以匈奴人与突厥人的名目创造一段世界历史的那个时期。在计划世界大行动之前，新国家的都城建于和林，即在旧匈奴帝国的中心。

蒙古的传说，以下述的话，象征一二○六年的大事：在斡难河大会召开前几天，有一只鸟天天栖在铁木真帐篷前的一块圆石上。它不停地鸣叫：成吉思，成吉思，成吉思！到了第三天，石头裂开，中间现出一块蒙古帝国的宝印，印作龟的形状。可是，匈奴人和旧突厥人早就使用过龟形的宝印了。

成吉思汗对于新的敌人做了一个通盘计划。现在，国家内部稳定了，他似乎理当对外展示其坚强力量。蒙古帝国与亚细亚好几个大强国接壤。她们个个都赶得上她，或甚至比她强。截至这个时候为止，成吉思汗吞并了无数的小部落和无主的残余部落，他渐渐地用他的组

织填满了在政治上自由的蒙古高原。可是，现在他要对付那些强大的国家。与这些国家逐鹿，决一雌雄。

在蒙古国的西部，是西辽，也是游牧部落组成的国家，她的构造与成吉思汗的国家相仿佛，是为被金国赶出中国北部的契丹所建立的。起初，成吉思汗不甚注意这个西辽国，因为他不能从帕米尔和天山那些山地找到什么东西可以满足蒙古人的物质精神。

在蒙古的南面，即戈壁沙漠之外，是金国。金国以其满洲各省环绕蒙古，直至蒙古东北面。其时，成吉思汗，名义上还是金国的藩属，他觉得与这个比他强大得多的敌人接触，现在，还不是时候。

可是，在那时，另有一个极其别致的国家，处于蒙古的西南面：西夏国。这个国家，同中原王朝已经脱离了许久，建立于黄河河套的西面。除其他省份外，她还包括着山西省，且伸展至青藏高原的脚下。西夏国受西藏佛教的影响比较大。西夏各地的人民——唐兀忒人，基本是信仰佛教的。然而，他们还是最以劫掠出名的。因其有组织的劫掠近邻各地，成为近邻的困扰。

成吉思汗首先锁定了这个国家进攻。他却名为金人出力，并以金国皇帝的陪臣身份，向西夏进兵，这样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集中精力进攻西夏，另一方面，可以打消金人的忧虑。金人当然愿意蒙古人制裁西部邻人的暴行，而且心中存着因这两方面彼此火并而削弱的希望。他们何曾想到成吉思汗恰是要利用西夏作逐鹿中原的跳板。

蒙古兼并了且摧毁了西夏国的最大部分土地。随后，它开始围攻西夏的都城——宁夏要塞。但是，它也遭受了一次严重的失败。大水突然降临，浸没了它的阵地，使之不得不解围而退。我们不能十分清楚，这到底是蒙古人引黄河灌城的企图弄巧成拙所致的，或者是唐兀忒人决堤灌水所致的。总而言之，大水及因水灾发生的瘟疫，曾使蒙古人畜大受损害。蒙古人以为西夏的国王——他的尊号为“活佛”，这显然说明了他的祖先源于西藏喇嘛——使用幻术而夺走了他们的胜

利。不过，成吉思汗仍然根据议和而得到了西夏很多土地。他满载宝物回到蒙古，且做了“活佛”的女婿。西夏国王自己说，在当务之急，最上计就是接受成吉思汗所强迫的和亲。

现在轮到华北的帝国了。成吉思汗提前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在他统一蒙古后，经过长期的整顿，在蒙古高原建立了一个巩固的蒙古部落联盟。同时，加强了同戈壁以南蒙古部落的联盟。那些部落还处在金朝的宗主权之下，被一一安置于万里长城沿边，以防卫大金帝国的门户。成吉思汗在向前进攻之先必须同他们取得联络。他充分利用这些部落仇视金朝皇帝的情绪，趁机将他的触角伸入到金国的内部政治里。他同被金人逐出中原的契丹的一个后裔隆重地刺血结盟。因此，他从这个力求复仇的部落里笼络了许多追随者；另一方面，现在他又有一种藉口——尽管这是他一手制造出来的——以讨伐金国：他不应该替结盟的兄弟报仇吗？“合法而行”这一原则，成吉思汗无论在对内政治上还是在对外政治上，从来没有轻忽过。最后，成吉思汗又同南宋皇帝订立密约，他又加上了第三个助手，即他的新盟友西夏国王。宋朝从来不曾忍受金人统治中国的北部：他们便欢迎这个盟友的到来。至于西夏人，遇到有利可图的地方，他们从来不会缺场的。

现在，金人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而不自知。加之，他们已经不像入主中原时的那样骁勇善战、精于骑射了。同其他游牧民族进入农业地区后的情况一样，他们变得慵懒了、柔弱了。而且，由于统治集团的压迫政策，人民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军队里的严重叛变情况更是层出不穷，可以说此时的金国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一二○八年，金国的皇帝驾崩。新皇帝遣使到蒙古各部。这个使者已不再要求蒙古纳供了；他向成吉思汗宣达新皇帝的旨意，并正式确认金国对成吉思汗名号和威权的承认。依照金国朝廷的礼仪，成吉思汗应当拜受新命。

然而，成吉思汗却不屈膝受命。恰恰相反，他向南公然吐唾，并说金主是一个蠢才，不能要求任何人服从他。他的祖先，有一天，曾

经扯过一个皇帝的胡须。他，成吉思汗，还要另扯这个皇帝的子孙呢！

使者急速回到朝中，报告了这件事。但是，金朝皇帝此时意识到本国已与宋和西夏交兵，周围的敌人已经太多了，最终忍下了这口怨气。因此，成吉思汗所希望的军事行动奇迹般地不曾发生。

蒙古人已经下定了决心，不管金国有无宣战，仍然发兵前进。成吉思汗调动了二十余万骑兵部队，穿过戈壁沙漠，来到万里长城脚下。边防长官看到如此庞大的军队如波涛般拥来，惊吓不已，急急赴京城向皇帝报告军情。皇帝不解蒙古军队突如其来的攻击原因。他并没有丝毫开罪于蒙古人，他反曾忍受他们种种折辱呢！最后，他还以为这或许是长城长官的过失，或许他没有同那些蒙古人相处融洽。因此，金朝皇帝下令逮捕了一个他的最忠实最智勇而丝毫无罪的将官。

他陆续派遣使者到成吉思汗军营，百般解释，充分谢罪，提议向成吉思汗纳币求和。然而，成吉思汗再也不肯停止进攻了。他认为同金朝作战是关系一切北方民族的生存问题的事件，他想借这次机会报复——在一千年后呢！——从前施于匈奴身上的损害。

第四章　草原上的锻炼者(4)

他的军队，分为数路，立即拥至金国北部各省。在平地上，蒙古人是稳操胜券的。无疑，最强的军队常常是属于金国方面，在技术上他们远远优于蒙古人。然而，恰是因为他们的累赘的军械，他们的弩，他们的火炮，用了几百人来放，一遇到成吉思汗的便捷骑兵，就失去了一切的作为。

反之，在围城战中，蒙古人蒙受到重大的损失，那些城垣防守周密，因而在初期，蒙古人进展十分缓慢。不久后，他们采取另一种战略，即按期退出长城外，而每年闯入金国地面。因此，战事拖延了四年之久。蒙古人恐怕得不到胜利，因为敌方随时从生产不竭的土地得到新的财源，因此他们改用恐怖政策。他们特意蹂躏地方以惊骇金人。六十个城市曾经被洗荡了，整个整个的行省被蹂躏了。

蒙古人的作战方法与时俱进。他们想出了可以保全他们军马的一个妙策。这个策略便是在进攻要塞的时候，骗当地人民走在他们前面；守城者因此不得不向他们自己的同胞射击。这种酷毒手段的成效是很可观的。到了一二一三年，金朝宫廷发生了叛乱，为首者是一名元帅（即胡沙虎）。皇帝被杀了，一个年轻的皇子作为军人党羽的傀儡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金宣宗）。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成吉思汗敏锐地觉察到了，趁着混乱状态发起了对金国都城的进攻。他迅速集中其军队后，于这年秋突然出现于北京周围，金国的心脏被包围了。

因为多次的事变，金国军队的信任度极度降低，因使开城出战的计划终于放弃不用，实则这个计划大有成功的希望。他们恐怕兵士一旦出城后，只有逃回自己家里，或甚至向蒙古人投降。

可是，成吉思汗还不想作最后决胜的进攻。流行的疫厉，及其军队不习惯此地的暖湿气候，这些曾削减了蒙古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双方同意议和。金朝皇帝同意立即交出一位公主及多名人质，并献出

大量的金银；蒙古军队占领北部若干要塞。议和即成，成吉思汗的军队回到了蒙古。

半年后，金朝皇帝以北京位置过北，不宜再做都城为由，于是迁往南京，即河南省的开封府。成吉思汗大为光火，认为这次迁都行动违反和约，因为，金国皇帝想藉此来躲避蒙古的势力。另一方面，南宋以金人迁都于黄河右岸，即接近宋帝国疆界的所在地，危害了宋朝的安全。因此，大家都要陷金朝于不义的地位了。

当成吉思汗再度出现于金国地面的时候，在北方各省中，基本上再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因为这些省份自认为被金国皇帝欺骗、遗弃了。金朝军队那么匆忙、那么神秘地离开了北京，甚至使皇室妃嫔都落在宫殿里。唯有人民自发起来做了一番拼命的抵抗，然而，他们毕竟不是蒙古人的对手。北京很快陷落了，许多金人，其中包括很多被军队所遗弃的长官，他们都自尽了。

经过战火的洗礼，北京城的昔日繁华已经不复存在。最后，蒙古军队一把火烧掉了金朝的皇宫，大火一月未熄。

第二年，蒙古人再次进入金国，直至南宋帝国的疆界，而且威临金朝的都城开封府。幸亏河北省发生了一番危迫的叛变，才使都城免于被扑灭。蒙古人放弃了黄河南岸，不久后，成吉思汗回到他的故土，准备去征服世界的另一地方。他在华北留下了一员最优秀的将官木华黎，连同三万名蒙古军及若干补助队，以完成其征服金国和南宋的事业。

第五章　神圣的大札撒(1)

在历史上，总有若干时代人们爱对事物做无穷无尽的去探究、分析。理想、组织、计划，在其实施之前，常常经过了它们的无数敌人的极力抨击。

中古时代的亚细亚人，尤其是蒙古人，对事物可没有这么抽象的耐力。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理想。但是，各种理想，照它们那样，却不曾受过抨击，而只有在其发起了行动和各种事变的情况下，它们才有着一种意义。从蒙古史的记述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探究的问题，实则那些分析是从若干世纪中流漏下来的。现在留在我们眼前的，是那些事实。至于成吉思汗的宏伟计划，他自己从来也没有依其所想像的及依其所采纳的，用口头或用字面对外宣布出来。理想随同其创造者而逝了。我们只能看到蒙古人的足迹，而那些足迹也有一半随时代而湮没了。后世只保存着军事征服的编年史，死亡与焚毁的清单，法律与敕令的残片，以及或作干枯无味的传说形式或作神话形式的若干故事而已。

可是，我们明白，出自赤手空拳而终于巅覆地球的一种事业，只有根据一种充分的理想才能产生出来。我们同时也明白：自囿于这个理想的实现，这等于说离开了显明事实的场合。在这种情事中，心理也使我们离开实际，因为它是我们时代和我们文化的一个产物。而在种族上，在时间上，在空间上，一个鸿沟隔断了我们与成吉思汗。

这个流荡天涯的游牧民族领袖的伟大理想，即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且赋于他以上帝般力量的伟大理想，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从他脑中产生出来的呢？是否当铁木真踯躅于无涯际的天边的时候，这个理想偶然一天像神怪似的从荒原中产生出来呢？或是当他在野幕的火边静听老辈闲话过去的时候，世界的形影以一个无防御的战利品出现于他的眼中呢？

我们都不晓得。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应该在最初是一个纯粹理想，藉人的意志与奇想而构造出来，没有经过商讨与计算，没有受到从实际考虑的纷扰。当政治家们的估量曾在其中有所增补之先，事业已经在梦幻中完成了。

在那时候，未来的统治者不能精确地洞悉其意志的远大与其行动的阶段，这是比较有利于其成长的。假使他晓得其未来的敌人们的武装情况，他就会明白世界实际上是如何构造的，他或许要放弃自己的计划了。梦幻应当在最初的时候表现得十分强烈，因使实际的困难现状并打消或减弱他们理想的光芒，亦或更增加了他们的理想光芒发扬光大。

因为，不久后，成吉思汗就不得不承认这个形势了：世界非常的广大，而他的势力范围在一时却是那么地狭小。他深深体会到如要达到目的，就要先将在下者抬到上层。第一个条件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民族。然而，这个民族并没有存在！这需要严厉的法制与随时可资行动的国家组织。然而，蒙古各部落仍处于混乱的状态！

唯有野心始终是一团烈焰，在那些事实的力量前，这个烈焰变得闪烁无力了，而依违于当时状态的没有目标的政客将只能面对失败而束手无策了。像成吉思汗，自命为世界的合法主人翁，而那时还要恐惧于每个强横的部落首领，假如面对着实际现状，他不能闭下眼睛而做他的梦想，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成吉思汗所资以建立其国家的材料，在其开始时代，是极其薄弱的。无疑，游牧人民仍为过去永远如是的出色斗士，富有征服与大无畏的精神。然而，谈到秩序与服从，那他们便不高明了。不间断的战争与彼此关系的不稳定，甚至扰乱了彼此互为亲属的各部落的天然关系。骨肉的残杀、抢人、背誓、盗窃、勒迫，都是常见的事。就是我们认为成吉思汗可以驯服他们，可是，靠他们来创造一个国家，这是无法想像的。

在成吉思汗的面前，有一个无比广大的行动空间。但最让他感到困难的，乃是必须以流血牺牲为代价，然后国家构造才能进展，而他必须维持这种流血斗争的局面，但是为着藉此以挽救自己的生命。他须同时播种战争的种子而又要去教化人、杀人而又化人，伤人而又疗人。

成吉思汗立国之初三十年，在对外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他的任何举动都不能让人怀疑他在蒙古地面准备着什么特珠的和新的创建来。然而，恰是这个朝气蓬勃的少年在蒙古高原纵马驰骋的年头中，通过努力奋斗，纵横捭阖，逐步在各方面实现了建立国家的雏形。当他的国家第一次以一二○六年大会的决议而初具规模的时候，一切都已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调动的预备军队，屡试不爽而实际可用的法制，根据伟大传统习惯的国家理想。而对中原王朝来说，即这个新建立的草原强国第一刀指向了他们，人们惊异地发现从数年前混乱不堪的地方来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战争创造了蒙古帝国。直至最后之日，战争仍是帝国的目的和帝国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成吉思汗以军队当作其创造?的骨干的缘故。按蒙古各部落的作战能力来说，他不需要作准备战争的动员，关于兵员问题，他并不必在那上面发愁。游牧民族是人人皆兵，甚至妇女也常常随军出征。问题在于将那些武装群众练成一种随时可用和无条件受训练的利器。必需制止那些独立倾向的人，灭亡朝代的代表者，以及其他仇视现存国家的人，有利用军队之可能。创立一个军事国家，在那里面，军队的权力占了第一位，而又不至对政府构成威胁，这不是一个平凡的工作。可是，成吉思汗曾尽善尽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使此后永远不发生叛变的事情，即使传到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也不会发生。罗马武士斗争的祸患，在蒙古国家不曾发生。

成吉思汗先从完全改组军队着手。截至那个时候，人们只见过以家族与部落为组织军队的单位。这种队伍，代表着独立主义派主张的危险地方，现在被解散了。成吉思汗把军队分为每一万人的单位，号

为“图蛮（Touman）”。其中之一个“图蛮”，是一整个的军团，它拥有广大的独立权，并直接由君主发号施令。就是皇朝的亲王，也没有将“图蛮”的人员互相调动的权限，这个限制的目标是求避免各军团发生不和与嫉妒。挂藉于某一个图蛮，甚至被指为世袭的，这是要在军队里制造出一种特别的传统关系。一个人的后裔，虽经过好几世纪，仍然在同一旗下服役。

从外表看来，这一类军团所呈现的状态，虽然看起来是很严密的，一种活泼的生活和军队各阶层中之恒久不变的运用，却使之蓬勃有生气。军队内部的管理是近于德谟克拉西式的（民主——译者注。）。首领由下级军人选举。每十人选出一个什长。各什长合起来就他们里面选出一个官长，这个官长统带一百人；那些百夫长选出他们的官长，在这个官长号令下的有一千人，而这些千夫长最后选出图蛮的长官。军令严格地规定最有能力的应得到迅速的擢拔。每个士兵都应知道元帅的令杖存在于他们的囊中。

成吉思汗，以其军队统帅为专制君主的身份，当然可以随时更改军官的进级程序。不称其位的军官可受降黜处分。可是，升级的标准，并不是只在于骁勇善战。一个首领，凭藉其毅力与魁梧的体格，而不懂得军队的运用，成吉思汗则认他为完全不堪任用的。

军队应成为一种平民的军队。出身的来历可以不论，而唯有能力才可作为标准。即使昨天还是敌人，一旦忠实输诚，则一切上进之阶都可让他走上。当成吉思汗有一天发现了在俘虏里面有一名手段高强的弓手，他便给以献其所能的机会。这个人不仅能射中极小的鸟，且能使第一枝箭的中间被另一枝箭贯穿了。过了几年后，这个人便成了一个图蛮的长官。

第五章　神圣的大札撒(2)

哲别（Djebe），骑军大将，也受过同样的遭遇，他是以蒙古人的俘虏身份出来的。他曾被判处死刑；可是，在未就刑之前，成吉思汗给他一次表现能力的机会。在这次决斗中，成吉思汗将自己所骑的白马供他使用。在决斗时，哲别表现非常出色，但损坏了成吉思汗的战马。然而，他却得到了赦免，且破格得到升擢。他第一次的胜仗，曾使他有机会表示其感激君主之豁达大度的心意。哲别不但并吞了一个新王国，且将其在当地收罗的精良白马一万匹，连同捷音献与君王。

成吉思汗，以其公正与恩惠，得到了各将领绝对服从。他废除了亚细亚古代传下的习惯，不把败军之将不问情由地处以死刑；在另一方面，那些拥有军队的人们，像国王似的统治着边远的省份，而可听凭大可汗的使者来逮捕，无抵抗地受其杖责，甚至于引颈就戮。

军法是很严峻的。不仅叛变者和临阵脱逃者要判处死刑，而未奉命令而迳行放火者，容纵俘虏者，窃取同伴的马匹或其战利品者，都要处以死刑。

在作战时，军队的食粮须取资于敌人。恰是这种习惯，使蒙古军成为相当可怖的人，且鼓起他们的进攻意志，使之达到最高的限度。然而，按军律的规定，战利器应当交出来，而且要等到打完仗后，才许不分等级不计尊卑由官长进行分配。因此，军队的动作力量不至因士兵的贪婪而陷于萎靡之地。

成吉思汗的军队起初以骑兵组成。到后来，才加上步、炮、工各兵种，这些队伍多数以汉地与波斯的俘虏人员构成的。阵法是以匈奴人从前已经用过的三方面组织法为基础，将它分为中央、右翼与左翼。这些古式的军事名词深入到乌拉、阿尔泰系各游牧民族的生活里，循至国家的组织和地理的命名里都有这些名词存在。满洲的居民还被名为“左方人”，而高加索的某一游牧部落，则以左、右、中央等名词来表示方向。

在蒙古的军事策略中，诈术与伪逃有着重大的作用。如果在初次进攻中，他们不能撼动敌人，军队立即向后退却，不任其作流血的肉搏。中军诱引来追的敌军，两翼的轻捷军队离开阵地，他们的行动是那么迅速，因使敌人失掉任何接触，而且不知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蒙古军的主力。而蒙古军的主力，迅速地漫山遍野拥来，突袭敌军的侧面。如若敌军虽然遭到包围，但还须冒重大的损失才能把它打败，则蒙古军会让出一条出道给他们——可能的话，则在事先选定一个不利敌军的地方——且让他们稍为向前进，使之放弃了原有的阵势并疏忽了必要的掩护。然后蒙古军队以其闪电般的优势追上并突袭敌军。有的时候，他们故意将掠获物及自己的辎重留在后面，借此能更容易地进迫敌人。蒙古军队一般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类似后来的“闪电战”，经常让敌人迅雷不及掩耳，其法是使全阵颠倒，而以快速而精准的行动执行之。执行动作之后，一翼军队力量减弱且离开原阵地，同时，另一翼则力量增加而奋力拥至敌军正面。

一旦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他们立即利用其进军迅速的优点：切断敌人的粮道，隔绝要塞与阵地军队。然后，他们便执行迅捷的进攻与派遣探察的巡逻队。

在人数上，成吉思汗的军队几乎历来是低于敌人的。他的战略必需居于优势，而且尽力避免军队遭受损失。围城工作是特别费时费人马的；所以他们越来越利用当地非战斗的人民，在攻城时候，将他们驱赶在前面。

成吉思汗在每次战役前都先经过周密的筹划布置，甚至于极小的细节都要反复措置。像战败者后来这样描述成吉思汗的军队说：“不可胜数的野蛮人的无秩序的袭击。”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认识。成吉思汗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搜集有关敌人在内政上和军事的弱点的情报，继而根据这些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进行精密计划，然后开始执行。成吉思汗先是派遣使者前往敌人的阵营，要求对方和平屈服。如果对方愿意和平屈服，对方便须按其所有纳出十分之一，人口也包括在那里面。

还必当供给后勤部队、道路、要塞以及军械来源的实况，以及人质，熟悉地图的头目，最后还须接受蒙古戍兵驻扎在若干军事地点。

如果对方拒绝投降，则战时的法律勒令将敌人全部破毁。到那时候，如果他们认为普通人民有自动反抗的嫌疑的话，他们甚至全部予以歼灭。城市被毁平了，田野被洗荡了。因为他们自己人数较少，蒙古人不能听任在其后方有富庶土地存在，不能冒着叛变情事的危险。成吉思汗告诫他的将领说："和受武力威服的敌人，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世界是广大的，而他呢？却没有费二次工夫来戡定一个地方的时间。他不是基于残狠而杀人的。他只顾着达到自己的目标，即宰制世界所必需的手段。

有若干要素，即中古时代倾人家国的发明，先使蒙古军队占了极大的优势：驿站路线与情报机关的运用，其迅速与安稳非常惊人；不领军饷的平民军队，按照强制服役的原则而编入队伍，也是只有所得而毫无所失的；因为军队的给养唯有取资于战利品这一事实，军队的进取精神始终维持着；因为使用最上乘的马力而且将辎重减至最低限度，军队的动作极其迅捷；军队的器械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要经过规定与监督；最后是那一种无与伦比的斗争精神与集体行动的精神，为维持这种精神，个人失掉一切地位，而纪律则操纵一切，而且每个人不曾考虑到无目标的英雄主义，也不考虑个人的恐怖或疑虑。在上述种种优点之外，我们还须加上蒙古人的战略战术，那种战略，在与旧世界的陈旧技术相映之下，实抓住了每个未见未闻的要点，且其使用匈奴人的古代弓箭也能如汉人使用新式的火器一样威猛。

在欧洲，过了好几世纪后，人们才知道蒙古人作战的若干教练与规条的优点。

在一二○六年的斡难河源大会中，成吉思汗颁布了一篇法令；从这个时候起，在百余年中，这篇法令施行于亚细亚全部及欧罗巴之一部。它的名字为"札撒克"（Iassa），即集训诫、命令、判决而成的。

人类自愿受最复杂最奇异的法典所箝制。僧侣、哲学家、社会学家，个个都将其脑中最庞杂的产物放到那里面。迷信、乌托邦思想、专制主义以及贪利思想，个个都曾企图以明文建立与实现其本身的权力。然而，向来没有一个独裁者的刚强意志，能像在札撒克里得到那么伟大的表现，以定立最高民族主义的计划。

札撒克是一个其实行结果必当征服世界的计划。同时，它又是悬在这个被征服的世界之上的利剑。即如摩西十诫，欲在人间建立上帝的王国，而与札撒克的口气相形之下，也要黯然失色了。因为，在札撒克里，以全球大帝的军队来代表的死刑——咄咄逼人而又是无可逃脱的——却是站在每条法律裁定的后面。而许多整个的民族，触犯了法律——往往是在不自觉中——就要听从蒙古利剑的惩处了。

成吉思汗，这个立法者并不需要解释其所携来的新伦理的理由。他的民族的至高无上权，必须藉札撒克而得到，就是其充分的理由了。而他呢，独裁之人，是以他民族的意志与精神投附于他个人身上。所以，他可以说：我要！而且说：你们应该！所以，对他的决定不得用上诉来反对，而每有犯法便是该死的罪恶，就应立刻受利剑的诛戮。

第五章　神圣的大札撒(3)

札撒克像一个命令对成吉思汗的子民颁布出来。加之，他将法令刻在军队时常来往的各条干路的石头上。所以我们能在俯临世界的帕米尔岩壁上念出用大字写的第一条：

“不服从札撒克者杀。”再往后，我们可以看见：

“天上只有一个看不见的天帝，地上只有一个可汗。唯一可汗是成吉思汗。”

全部的义务以明晰的文字昭告国民，在义务里国民将得到他们的目标与幸福：“蒙古人的天职为应我的召唤而来，我的命令而去，视我指谁而杀。”它又说，“蒙古人的最大福祉为战胜敌人，掠取敌人的宝藏，使敌人的臣民宛转呻吟，驾敌人的肥马而疾走，……”

后面则列举战时的军法，其中有一长篇关于处死刑的过失：斥候之疏忽，驿使之醉酒，反叛，作内间，不传递命令。未得统兵官特别许可而施惠者，将非其分内的战利品拥为己有者，偷窃同伴所有者，拒绝供给马匹者，以及拒绝供养成吉思汗的驿使者，都同样受死刑的处分。

其他的规定是关于战利品与统兵权的分配。万夫长（即图蛮的首领）只奉可汗的命令，并须一味遵从他的意志。每个壮丁都应服军役。留在家中者必须替国家工作，而不得有享受报酬的权利。再往后，里面还说道：“能拥有一户者可统带十人。能统带十人者可统带万人。但我要杀掉无能力的官长。”

在列举关于洗刷和挑选马匹的实用规则后，我们看到这样一句严厉的话：“禁止与还未服顺的敌人议和。收纳逃亡者的人，应作为敌人看待。”

当男人外出时候，妇女应在家看守产业，并可随意买进和买出。贤明的成吉思汗说道：“我们承认一个男人对其妻子的德行。”

若干特种权利是赋予一批少数的人。这些享有特权者为成吉思汗少年时代的同伴，及自己冒险而救了成吉思汗性命的军官。他们有随时进入成吉思汗帐幕的权利，在分摊战利品中，他们享有优先权。有一个奇异的条款，即按照规定，这些武士可以犯罪九次，到第九次才应依法办罪。成吉思汗是效法天帝而制定法典的，他当然也行使其权利而事先颁布恩典。

确定蒙古人社会的权利与义务的那几个条款，是与战时法典一样明显而严厉。惩罚分为四等，而加于罪人身上：死刑，断四肢，杖刑，罚锾。后者一般是按照被窃的或被损坏的物品价值的九倍计算。

偷窃牲畜是一种重罪，而应受死刑的处分。如背誓、狡诈、鸡奸、强奸、通奸，以及同处女的淫行，同样都受死刑的处分。凡以强暴手段而发生先期生育的情事，应罚牲畜，其数量按照胎儿的月数计算。饕餮，不招待外人，及无理参预斗殴的情事，应受严酷肉刑的处分，而在某几种情形中，还受到了死刑的处分。

这些法律当然只对蒙古人生效。敌人是没有权利的。他们一般是被当作战利品看待，一经按照法律予以分配后，所有者可以随便处置。札撒克的意义，恰是要显出蒙古人对于被征服的群众是处于主人翁民族的地位，同时特许这个民族享受一种特殊的环境。过了许多年后，到成吉思汗的后人统治中，人们想将札撒克的纯粹民族主义的伦理基础改为另一种伦理基础的时候，才将法律的权利与保护扩大施行于非蒙古族的帝国居民。然而，这种措置等于同成吉思汗所昭示的意义决裂了。

关于司法诉讼方面，成吉思汗确立的方针是非常明显而合人心意的。唯有当场犯罪或供认自己犯罪的，才能有罪名的成立。犯罪的征象是不能作根据的。但是，如果其中有重大的嫌疑，则可使用刑讯以求口供。男人的誓言较女人的誓言有价值。奴隶指控其主人的言语，他必须能证实其先前所说无可驳斥的理由，才能发生效力——譬如他

能指出主人所偷的东西。年轻的女奴，如果同他的主人发生了性关系，则不能充当证人。

在这些有理由的和有用的规定之外，也有其他莫明其妙的规定。譬如，向灰中与河中便溺的行为，受到了严厉的禁止，并予以死刑的处分。又如怒目注视他人的户内，及经过首领的帐篷时手触它的户限，同样受了禁止。传统的不洁曾藉这样一句话得到赞许："一切是干净的，脏的全不存在。"在河中洗澡或洗衣者要丧失他的性命。皮衣须穿至完全不能使用的程度后，才许弃掉。当成吉思汗将这些奇异的风俗及其他来源于蒙古神话的风俗，用札撒克来定为法律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本人重视这些风俗，而是因为受了保守主义惯性。民族的每个特殊性都是他所珍惜的，因为，蒙古民族在法律保护之下，将于世界其他民族发生更密切的接触。所以，成吉思汗保留着蒙古老式的屠宰方法。牲畜应当背贴地面，而其胸部应切开一道大裂口。那时候，抓着仍在跳动的心脏，把它压平，直至牲畜断气为止。其他的屠宰方法，都不许使用，如有犯者，要受死刑的处分。

蒙古人的亲属与继承的权利，也在札撒克里得到?严峻的族长制的确定。那些旧的风俗，从以买卖成交的婚姻以至已经死亡的男女互相结婚的奇异的仪式，仍然保留着，这种保留被认为是必需的。

为使出生的数目得尽量提高，成吉思汗勒令每户至少每年要举行一次结婚。蒙古臣民的一切少妇与少女当然应随时可供君主及其儿子的征求。

成吉思汗以承认和保守已经存在于世界的事物为基础，这对于其复兴蒙古族及未来的事业，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其核心观念是：一切都合于逻辑地建筑于过去的历史与习惯上。

蒙古族缺乏明显的灵魂观念，当然，这是指蒙古人对于宗教无所轻重的事实而言的，也给成吉思汗的法典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成吉思汗将这个状态制成了一条法律和一条立国的原则，并根据它而缔造了创立帝国的理想。他要大家对于宗教绝对放任。一切宗教都须以默认

一尊看不见的天帝为基础，其他的地方无非是宗教的形式，可任每个人自己自由取舍。大家用什么方法，甚至用暧昧态度，来尊敬天帝，他是不过问的；他所要过问的，乃是对看得见的世界大君——成吉思汗——的尊敬应有具体的和切实的表现。

蒙古人对于各种宗教采取无所可否而不得罪的态度，后来曾使他们在形而上学非常沸腾的亚细亚里，得到了广大的用处。放任的原则使蒙古每战必胜，几乎可与成吉思汗的军队相等。在一百多年中，这个原则始终为蒙古政治家手中的主要利器。

成吉思汗曾将种族的灵魂力量集中于这个无宗教国家的伟大理想上。这不仅要使大家的精力专为无宗教的国家效劳。特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而培育的宗教传染免疫力，曾到处使蒙古人大受其利，且使之得到超过他们所遇到的敌人的力量。他们是实事求是的，利己的，有理解力的：每时每刻，他们都看到了出自本然的世界。他们不知疑虑，因为他们心中所顾虑的唯一权力，是可汗命令的。他们明确知道这种态度有助于其遵守法律的，而违犯法律便要丧失自己的生命。

第五章　神圣的大札撒(4)

札撒克经大家不加任何批评而接受了。它并不算是与传统习惯决裂，而在蒙古人看来，那些或可与它对抗的宗教要素并没有存在。在他们心中，信仰从来没有成立过，而成吉思汗则采取了若干措置，以求僧侣方面不至提出反对。他固然使僧侣同博学者及艺人一样，免纳租税，但同时他规定宗教团体的代表者不得占据任何政府的职位。国家与教会的分立，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促成成吉思汗在天上与人间之中划了一道明显的界线者，还不是过去的不幸的经验；我们或可相信这个创案始祖，依其伟大政治家的本能，预先料到神权与俗权混合所可能引起危害其帝业的一切危险。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他的理由。在他的孙子朝中，帝国曾因宗教纠纷的震荡而发生动摇了，而在札撒克颁布七百年后，征服民族的后裔，被无数的和无厌的僧侣所侵蚀，直至被吸尽了骨髓，而过着穷苦的生涯。

的确，在一二○六年的大会中，即札撒克产生的所在，成吉思汗曾利用教徒以感动易于信仰的人民。然而，一到了他的继父的儿子——一个著名的萨满——提出了他的要求并企图在国家弄权的时候，成吉思汗就表现出了他对教徒的态度：他让他的一个儿子以摔跤的名义，将这个萨满一脚踢出门外，而竟使之死在帐前。

这是因为成吉思汗并不需要抬高身份的宗教影响。他的命令就足以在数年之中制定了他的各种人民间的秩序，并足以重振伦理观念——尽量在他认为国家所必需的范围内。从非蒙古史家的记述里，我们知道，过了不久后，违犯札撒克的情事不再发生了，每家都可尽夜不关帐篷的门户，蒙古人彼此不食言。蒙古妇女的贞德，甚至引起了欧洲人的赞赏。

这个世界主人翁也不为自身的利害而需要神圣。他甚至无需藉亚细亚所尊崇的那些天神表像来自炫，也无需藉重于尊严的称号。他在其命令上，只签了一个字：成吉思汗。像耶和华一样，他说：“你们不

得随便使用我的名字。”他的话是坚硬的，明晰的，不加丝毫润饰的。据称，他的一个书记官有一次在他的敕令上装饰了东方的多礼饰语，他便把这个书记官杀掉了。

有人这样记述道，这个沉潜而自信的君主，遵照蒙古的旧习惯，他只向其看不见的天帝要求两件事：健康与长寿。在想到他总有一天死掉，他心中很苦恼。他并不是把生命看得很重！他往往不顾生命来冒险，甚至在他的老年时代，只要这种举动是必要的，历来他都亲自统率军队来攻击敌人。但是，他知道在他生存之日，帝国是安稳的，到他死后，帝国将随之崩坏。唯有他一个人，有力量来实现伟大的理想，和带领他的骑兵达到地球的极点。因为顾虑他的事业，成吉思汗希望能长生不死。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个小孩似的那么迷信。他往往为恶梦所惊，请教于神明，身边环列了许多术士。

有一天，他听说有一个汉地老人发现了“致圣的宝石”。他立刻把这个人召来，因为他以为可以得到克服死亡的方法。这是值得探求的；他自己并不知道其他致圣之道。

可是，成吉思汗失望了。这个术士乃是一位哲学家。他所送给成吉思汗的，并不是一道符录或一个法术，乃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箴言：可汗应知鄙弃他的光荣、人欲及个人地位；那么，死生可合而为一，而死亡便非可怕的东西了。

他，成吉思汗，对这种圣道能有什么用处呢？他忍气把哲学家送回去了。他明白了他不用想长生不老。然而，结果他算出他应尽量利用他有限的光阴。他将自己尚可生存的光阴与他尚须前进以达到世界极端的路途比较长短。

而成吉思汗，在此身未死之前，总不能轻易放弃他的旅程啊！

第六章　强敌相遇(1)

在亚细亚的核心地带，西辽帝国，以喀什噶尔为都城，其版图西起咸海及锡尔河，东起阿尔泰山与西戈壁，南部疆界则为切断西辽与西藏的昆仑山。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其面积是不亚于英属印度，在那里，四面八方伸展着沙漠、荒原以及高山峻岭。

西辽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的创造物，其中没有固定生活的组织，产生于上亚细亚各民族迁移转徙的混沌状态中。这乃是围绕于强过其他部落的一种漂游无定游牧部落的王子帐中，藉偷窃与长途觅食而发展的一个国家。她只有一个短促的生命，仅仅经过一百年的历程后，便在历史上消失了，而不曾留下细微的踪迹。她同许多同类的部落一样堕于这个结局，他们同经亚细亚的历史旋风卷在一起，随后又被其扫荡干净。如果在东方与西方大战的初期，西辽不曾有过扮演重要角色的地位，则在今日我们或许把她忘记了。

在这个有历史地位的一刹那，西辽的主人翁——契丹，最初聚居于现在的中国东北地区，在东经三十五度以东。在他们尚未成立其奇异的山地帝国之先，他们已经代替那些游牧各部落度过典型的冒险远征的生涯。在本书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们曾于十世纪中鲸吞中国北部，直至黄河，并且建立了辽朝。在十二世纪中，他们被其同种兄弟女真人逐出中原，他们由是负创往西退却。的确，他们回到满洲故土的路途是被切断了，他们只能退往戈壁沙漠的后面，而其幸运的继承人则安安稳稳地坐在纷扰不宁的地区里，建立了金国。

契丹人，照其游牧民族的习性，是不为行程所困苦的，起初，他们想一直推进到阿拉伯，因为商队的领路人曾叙述很多关于阿拉伯珍宝的故事。这个富丽异常的国家，应位于西方远处某一地方。它的距离，不论远近如何，这都是无关重要的！契丹人对于再跑一次经度三十五度的空间，是满不在乎的！

然而，他们不久就知道世界是已经被人分配完毕了，而无主的荒原并不到处存在。在帕米尔山脚及肥沃的斐加那（Fergana）地方，他们已经同阿拉伯军队接触了。那些军队恰是在契丹人所决与寻衅的阿拉伯人的旗帜下，而与契丹人抗战。在旧亚细亚的边界上，上亚细亚骑兵前进的路途被切断了。于是他们不再奢望，放弃其伟大的计划，而甘心居于较贫穷而在军事地位上很有利的锡尔河和阿尔泰山之间的山地。在这个政治上无所归属的地面，他们依据帕米尔的地势，建立了哈喇契丹帝国。哈喇契丹名字的意义是说“黑契丹”。这个名字足使人追忆其曾经的皇业。从组织上说，这个西辽国一向不曾脱离其藉很松弛的联系而集合的游牧各部落所构成的联邦形态。

在十三世纪头几十年中，即成吉思汗在东亚细亚的势力开始迅速发展的时期，西辽的东部边界不曾划清，且变动无定，这也就是迁移无定的民族所常有的状态。有些部落，比较愿意隶属于西部蒙古各部落，实则他们已经是喀什噶尔皇帝所封建的。可是，喀什噶尔并不密切注意他们。在那时候，他的政策是专注于西方的，因为他正同花剌子模的算端（即苏丹）争夺锡尔河的沃地。这个偶然的机会对成吉思汗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因为他的上亚细亚危险敌人不能转动，他的行动就比较宽松起来。

在那时，契丹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曾使之拥有某一种政治上的重要性。他们掌握了伊朗与突厥的咽喉，俨若高地堡垒的守护者，这个保垒，犹同Janus神的前后双脸，同时俯瞰东方与西方，在这种情形下，契丹人实做了天平的支针。中世纪时代唯一通行东方的军事的与商队的路途，即天山北部的准加里（Dzoungarie）门，和畏兀儿部在塔里木盆地的商业路途，都操纵于契丹手里。若是一个积极而有魄力的国家，就知道利用这个中心的地位。然而，契丹不再施展雄图了，而使其优势的地位竟反而做了他们的祸害。有一天，他们受了两个渴望发展的邻国两面夹攻，这两个邻

国都想觊觎世界的主权。西辽由是成为缓冲的国家，当其领导者看清当时情形之前，灾祸已经降临了。

在这期间，成吉思汗完成了统一蒙古与塔里木盆地各部落的工作。他于一二○六年的大会所缔造的国家，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强国。他的国家拥有大片的土地，而在其与汉地作敌对的斗争中，他曾表现了他的支撑力量。乃蛮与畏兀儿——同为喀什噶尔皇帝的旧附庸——的降服，表现了成吉思汗对于西辽的敬意已经减少，如若有事于西方的西辽，不对损害其宗主权的行为采取了反抗行动，这就要损害了契丹在蒙古人心中的威望。可是，除西辽明显暴露其弱点之外，此时另有一个原因，引起了成吉思汗注意在西方所发生的事情，他，已经拥有塔里木盆地和畏兀儿昔日的足迹，从此以后，守护商队大路的责任落在他身上了。他的崇高身份要他如此！在昨天，成吉思汗在经济问题的范围内，眼光还是?限的，现在突然明白世界贸易的意义了。他的昌盛的尚武国家，无耕种而膏腴的土地，几将缺乏各种原料，是极需要外来输入商品的。尤其是，她缺乏兵器。

在中世纪时代，在亚洲和欧洲，兵器工业主要集中于阿拉伯和美索不达米亚。最精良的刀剑来自于大马士革。在希望购买廉价货物的情况下，成吉思汗对于通商自由便表示同情了。

然而，从大马士革至贝加尔，路途是相当遥远的。一条商队大路的每个所有者，都设立了关卡，征收捐税，因而抬高了货物的售价。特别是契丹人，居于山地，他们从路上征税的收入多于他们种地的收入。征税的制度，同大路上强盗所用的方法比较，几乎相差无几。

成吉思汗即使心中不存在统治世界的理想，而对于西辽居于他的前面，总认为是眼中钉，这是不言而喻的。他所遭遇的形势，恰与在他之前七百年的突厥人所遭遇的一样。上亚细亚的每个新强国，必需求得商业的交通，而不与西方发生龃龉。

还有另一个要素，也为成吉思汗与西辽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西辽是一个纯粹的游牧民族的国家，她的人民与蒙古人同属一种。在骑

士民族之上，就不应有两个皇帝同时统治！

这样，开战的原因是不可或缺的。如有必要的话，就可有所藉口。成吉思汗历来是主张合法行动的，历来是要保持公理的外表的——特别是对于有了那么悠久而光荣历史的契丹朝，他现在是待机而动，其实，在那一刹那，他在中原方面，正在玩弄西辽的同宗——辽帝国的契丹，与之共同打击金人。蒙古人不欲使局势转变太快，但是，在未雨绸缪之下，他抢占了先机。

第六章　强敌相遇(2)

在当时的情况下，契丹人似乎是盲目的。他们历来只注意西方，没有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面的危险逐步加大而不自知。

在西方，花剌子模的沙王摩诃末，曾在塞尔柱帝国的残迹上，建立了一个武备繁盛的大国，其国土南自印度边界和波斯湾，向北伸展至黑海和里海，西自阿拉伯向东到咸海和帕米尔的西坡。伊斯兰世界的带甲之士，几乎全部站在摩诃末的旗帜下而奋斗，这个国家简直是伊斯兰教多种族的一个大教堂。侨居于西部的突厥人，即摩诃末本身所隶属的宗族，曾在其中占了重要地位；这往往不免同土著的波斯人民发生冲突。然而，文化和民族的缺乏一致，却被共同信仰的烈焰所笼盖了。伊斯兰世界显耀的武功习尚，在若干世纪中，从阿拉伯人传至西亚细亚的突厥人，现在仍继续受人热烈地信奉。这个时候，伊斯兰世界的一切门面与光彩，虽已稍见衰颓，却仍力量雄厚，都聚集于摩诃末国内。昔日的伊斯兰帝国哈里发已不再是一个有权力的教主，这个无权力的教主，则死气沉沉，驻于巴格达，听受突厥武士贵族的操纵。摩诃末沙王就成了伊斯兰信徒真正的领导者。

其实，这位摩诃末乃是一个暴发户；他的祖先是塞勒术克王朝的奴隶。然而，这并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恰恰相反，他却有些不耐受那些虚荣，他，是巴格达哈里发所恐惧的，他，是不花剌和撒马耳罕——伊斯兰各都市的核心——的学院所歌功颂德的（因为这些学院是他所支配所维持的。）

这样，在十三世纪初年，有两个席卷世界的君主统治于亚细亚，这两个强国都是武备充实的。他们两个都渴望从事新的征服，都是要统一寰宇的。可是，在蒙古帝国与伊斯兰帝国的政府结构之间，彼此有什么不同呢？

成吉思汗虽号为“上帝的人间祸魔”，而摩诃末亦称为“真主的幽魂”和“伊斯兰之狮”。成吉思汗藉其铁的意志与对其种族的天赋地位的

近似神秘的信念，作为其统治世界的要求，至于摩诃末则倚藉古波斯与伊斯兰的丰功伟绩的光荣，藉其代理伊斯兰教主穆罕默德约束人间的职务，与伊斯兰教真主的保护。这是种族起来与宗教斗争，未来与过去斗争，革命的饥饿与傲然自大的饱饫斗争。

一旦这两个强国彼此接触，冲突便不可避免了。因为她们两个都认对方为恒久不变的威胁，这不但从军事上说，同时从思想上说，也是如此。蒙古人根据民族的理想，以建立其帝国，他们否认宗教的意义。但是，在摩诃末国内；宗教乃是各民族间唯一的纽带，而种族问题却是它的弱点。摩诃末是许多突厥民族的君主，而成吉思汗根据种族的隶属，可要求这些民族归顺于他。反之，伊斯兰教徒则同心协力攻击附于蒙古军队的佛教徒、景教徒以及萨满教的信徒。两边的矛盾已是无法调和。

契丹人的缓冲国仍然把这两个敌人隔开。可是，这可再经多少时候？有一种暗中的力量，总是推动这两个大国彼此对抗，直至她们彼此的边界互相接触。这两个贪欲无厌的强国都已经觊觎喀什噶尔及其以外的地方了。

另有一个原因必然要使成吉思汗和摩诃末接触：这就是不幸的世界贸易了。沙王管理了西部的路途，可汗管理了东部的。设使二者之一对交通路线横施阻碍，则商品的一切交易都停顿了。在七百年前，这个缘因已足以引起战争。在中世纪时代，远方的贸易实为亚细亚内地的生死所关的财源。若干大民族所以生存，广大地域所以可居，都倚赖于商队贸易的运用。几个世纪后，海上贸易占领了海洋后，中央亚细亚这个大干路从此被人抛弃。而亚细亚腹地就沉沦于昏夜中了。

然而，在那时候，商队并不周行全球，而走向印度与极东，日内瓦，威尼斯，大马士革，不花剌，北京的市场，如遇有亚细亚荒原中的轻微的政治变化，便受影响。

十三世纪初年，贸易的自由与安全是极不令人满意的。契丹人是典型的强盗，在摩诃末国内，像在一切伊斯兰教的国家，关卡与捐税

是层出不穷的，而在这一点上，成吉思汗曾极受刺激。暴风雨已在密结中了。而第一个电光就打在西辽身上。

在这种危机之下，契丹人在做什么呢？当然，他们是做了最蠢的事。他们把自己的力量估量太高，而同时与两方面的大国为敌，妄想从中渔利。可是，这两个大国只等良好的时机降临而进行实际的行动。

战事是由屈出律的态度激起的，屈出律为乃蛮王子的儿子，曾为成吉思汗所败，且为成吉思汗积仇最深的敌人。他逃到喀什噶尔，要在那里重新组织抵抗力量。契丹的君主，不论是否愿意，总得看其是他陪臣的儿子，而予以收留。他甚至于超出了必要的范围，且以他的女儿嫁予屈出律。可是，他不敢再进一步；这位年老的君王没有与可怕的成吉思汗发生事端的勇气，也不敢替屈出律恢复他的权力。王罕的悲惨结局还在他的脑际中徘徊。

?然而，他已经做得太多了。屈出律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物，对他是不可施予丝毫恩惠的。这个武夫是毫无信义的。契丹一堕入他的术中，那非颠覆不可。屈出律造反了，他的奸谋成功掀起了一番反叛行动。在一夜之间，契丹王朝被推翻了，这个忘恩的驸马登上了宝座。

因为这次事变，中央亚细亚的政治状况完全改变了。契丹是一个悠久而不为害的朝代。然而，一个大国里有个篡位的君主，那就不同了！合法继承者成吉思汗与暴发户摩诃末，都想乘机打劫。在喀什噶尔扮演公正人的任务，这是不可能的吗？无论如何，总可从中得利的。因此，蒙古人与伊斯兰人都开始下手探试。

在成吉思汗看来，这个事件是很明显的：第一，现在事变已颠覆了契丹，除他之外，在原则上任何人都不得统治上亚细亚；第二，他不能等待屈出律动员邻国来攻击他。蒙古的尽所有敌人——人数并不少——已经都集中于喀什噶尔了。在成吉思汗方面看来，反应动作只有从事预防的战争。他命令哲别。这时哲别正在带领最精良的军队在

高丽征讨，便即速跑过了半个亚细亚大陆：这在他只算是一番小事情。屈出律还未坐稳他的宝座，而蒙古人已经来到他的国门了。

第六章　强敌相遇(3)

摩诃末并不因喀什噶尔的事变而感受到直接的威胁，他呢，是一个过时的人物，不能提出合法人的要求；然而，有时候，他追念了自己与契丹有着血统关系：直到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周顾他的同宗兄弟；他反而同他们发生争执。现在，戴了公正人的假面具，他开始玩政治的大把戏了。采取政治行动，这就是说，趁火打劫。在喀什噶尔，他同时与两方面谈判：一方他鼓励屈出律，另一方他维持被篡的契丹。当他把整个局面扰乱及双方敌人发生严重冲突后，他表演他的把戏，出兵占据了锡尔河流域。他借口说，他采取这次举动，是为这个地方的合法君主——契丹主——的利益着想的。可是，任何人都不能相信这种话，更不能同他争夺这个易于取得的掠获物。在这个时期，契丹是没有势力的，只能坐视种种变故发生。而屈出律在看到蒙古人从另一方进兵之下，不得不承认将这块土地割让于摩诃末沙王。河中省富庶的各都市与坚固的保垒，彼此争执那么久，现在都落到摩诃末手中了。

在这个时候，成吉思汗几乎将西辽其余各地都占领了，并且不曾遇到激烈的抵抗。有一个幸运的事情，而为大外交家成吉思汗所善与利用的，又格外使他的工作容易成功。

的确，屈出律听从了他的妻子的话，而做了极蠢的事情。这个女人是新近皈依景教的，她是最危险的，信仰过甚的。她日夜只怀着一个思想：扫灭国内一切非景教的宗教。而她呢，以其前皇帝女儿的地位，是唯一可使新君得到合法地位的光环的，屈出律因此不得不尽听她的意旨。他同意了危机重重的虐待异教徒的行为。宗教偏信的惨酷无比的悲剧，历来为亚细亚腹地完全所未睹的，现在逐幕在喀什噶尔上演了。若干伊斯兰教长被钉死于礼拜寺的门前，佛教长老被烧死于柴堆上。在前后若干星期中，基督教宣布大告胜利（见《多桑蒙古史》卷一第106页）。

可是，同大多数这种事情所产生的结果一样，国家总要分摊这种孽债。屈出律失去了他的人民所仅存的同情。

现在，成吉思汗知道怎样应付这种情况了。他的宗教自由的立国原则，又现出其为公正原则的面目了。他宣布保护被压迫的宗教。屈出律害了西辽的人民，因为他没有遵守札撒克的规条，而札撒克乃是一切骑士民族的法典。蒙古人自命为解放者。他们的军队曾在旗上大写了信教自由的可喜的纶音。每个人都可自由信奉其心中所喜悦的宗教，但教士在政治生活上所发生的不良影响，则非消灭不可。

在喀什噶尔，成吉思汗的军队不曾被人视同侵略者，却被人视为解放者。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发生冲突，而经过一个月后，新降者竟成了忠实的臣民。屈出律则身受悲惨的结局，他自己的部众却把他当一头狗似的杀死了。

成吉思汗灭西辽，几乎是不动声色，且成功非常迅速，竟使摩诃末在未及察觉之前，忽然有一天在其疆界上与新的邻人相见了。

花剌子模的东界为沙漠与山岭，那些山岭荒芜而人迹罕至，矗立于云霄里。在摩诃末极东的兵站与蒙古的前站之间，或许是相隔了几百里路。在这个地方，这样的距离，是非经几个月的辛苦跋涉不能穿过的。所以，在这两个新邻人之中，不能即时彼此接触。这两强国间所酿成的纠纷，并不像通常那样，先由边境兵站的小冲突开始的。这个世界大战，是以正常的商业斗争，在这两个彼此了解尚不十分清楚的敌人中开端的。

最先是由成吉思汗来同西方邻人发生关系。他派遣使者，越过崇山峻岭，来到沙王那里。使者携带了成吉思汗的敬意和礼物送与摩诃末沙王，并力陈商队大路上的正常运转有无是如何有利于彼此两国的。这在今日，将可说做“列国的共同经济利益”与“友好关系之诚意希望”了。好像成吉思汗曾向其邻邦提议订立一个正式的通商条约。

截至此时为止，一切经过都很良好，似乎亚细亚各民族的和平的黄金时代即将出现了。不幸的是，成吉思汗寄给摩诃末的书信却包含

了一个小小的恶作剧，配合很好的恶作剧。的确，先经提到可汗新近并吞了中国那么大的国家——还未曾提到许许多多其他国家——后，信里却又说了这一段话：像他本身是一个和平的君主，摩诃末对他丝毫不必有所忧虑；为表示诚心起见，他把这位西方的皇帝当作他的亲儿子看待。

可是，我们要知道，在亚细亚的外交辞令里，“儿子”这个字眼是代表什么意义；这等于说是附庸。或许，在那里面，成吉思汗是存心的。他的确自认为万王之王，如若他只愿得到表面上的降服，这已是他的豁达大度了。然而，号称“真主的幽魂”的摩诃末，却没有德意志腓特烈二世皇帝那么温情，后者曾于二十五年后，以滑稽的口吻回答蒙古人的一封同样措词的书信。

这一着是打倒了。摩诃末感觉到了口蜜腹剑的把戏。但他是很谨慎的，在未着手谈判之前，他要先进一步了解这位奇异而发言无状的东方皇帝，而他对于这位皇帝，甚至还不知道其真正的名字。因此，他私下向成吉思汗的使者打听。在四目相对之下，门户紧闭，他静听使者的报告。起初，他先重馈这个使者，馈赠使者就是说企图收买他。这一切预备动作，表现了沙王自己是无多大把握的。

摩诃末打听成吉思汗是否真的吞并了中国。使者承认了这件事，并将这个实情稍微说得夸张些。沙王便更加忧虑了。他不能想像出成吉思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并吞了像中国那么强大的国家——他也曾从天山之外知道这个国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摩诃末追问道：“成吉思汗的军队的确也同我的军队一样强盛吗？”

使者，或是因为怕失去他所得到的美丽赠品，或是因为要做他的主人的忠仆，期能更稳妥地把摩诃末拖入陷阱，就回答道：“你的权力就像太阳那么大，成吉思汗的权力则像月亮那么大。”

摩诃末表现出了他的满意情绪，而使者也可安安稳稳地携带了礼物回国。他以恭敬的友谊的诺言交使者带回去，但这种诺言并不表示

什么意义。摩诃末对于这个困难的问题，即他与成吉思汗两个人，哪一个该做父亲，哪一个该当儿子，不曾吐露真意。

摩诃末，吃了苦头而不敢做声，这种宽恕态度，是我们所不能马上明白的。寻求这个难于了解的事情的答案，或许应从巴格达当时的情况中了解。

第六章　强敌相遇(4)

的确，摩诃末——伊斯兰的宝剑——又与巴格达“哈里发”的“神”权发生冲突。在拥有最强者的权力之下，他曾废黜一个哈里发，而另立一个新的。他凭藉了一个神学博士会，将他所不喜欢的人摒于教外，而利用伊斯兰的什叶派（Chütes）与逊尼派（Sunnites）之间的旧仇。然而，被废的哈里发则以宣告废黜摩诃末来对付这次举动。在那时候，亚细亚的沙王与哈里发所处的地位，是与欧洲的教皇与皇帝无二致的。

在这次纠纷中，摩诃末表面上占了上风，且咄咄逼人，率领他的军队直抵巴格达城下。然而，哈里发的废黜令竟然削减了他的地位。凡想脱离摩诃末的臣民，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做脱离的行动。反对派，受宗教的两难论所鼓励，抬起头来了。沙王感觉到他的地位没有那么稳固，特别是现在遇了一个东方皇帝，后者似乎要组织一个联合一切游牧民族而不分宗教信仰的国家。摩诃末觉得他的最好的军队是突厥血统的军队。在这一刻，他不想贸然激起纠纷。

然而，像在内部未臻稳定的一切国家那样，花刺子模国内也存在着以为征服政策可以缓和内部冲突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禀承太后的意旨，曾大使沙王应付费力。

摩诃末对于蒙古国家的状况及其行动方法，所得到的报告，不过是根据谣传与推测，而成吉思汗对于西亚细亚的情况，似乎打听得非常清楚。有些历史家甚至以为成吉思汗与哈里发有联络，且以为成吉思汗曾接到哈里发与他结盟以抗沙王的提议。据说，在这次谈判中，哈里发曾使用那时代的一个方法，藉可以经过敌人的国境而暗通消息。“外交文书”是刺于一个剃光头的脑壳上，这个人同时又默记了文书的内容。当他的头发重新长出后，他便假装了商队的御者，前往蒙古。成吉思汗只须把使者的头发重新剃光，便可将口授的言词和书面的言词相对照了。

提出与巴格达结盟这一假设，它本身是有所根据的。因为，后来在摩诃末与成吉思汗发生斗争中，哈里发始终不曾加入其中，他始终没有宣告伊斯兰的“圣战”，来与成吉思汗对抗。至于蒙古人的暧昧态度，也是可以了解的，他，成吉思汗，为占着时间上的便宜起见，一方面作威胁行动，而另一方面又缓和局势，一面答应彼此和平无事，另一面则作战争的准备。成吉思汗深知时间的延长是对他有利的，且知摩诃末的宝座行将动摇了。蒙古人的时期总要降临，在这个时期，他将于世界万目睽睽之下拥有他的权力。他清楚地知道，如要发动这么大的斗争，那非处于无限制的无罪过的地位不可，尤其是他不愿只作简简单单的征服，而要建立万年无疆的游牧民族的合法帝国。

第一步就需要等待新商约的结果。

有一天，一个携带波斯货物的商队，来到哈剌和林——成吉思汗的都城。他们要昂贵无比的价格。在人们追问理由之下，他们便以曾经向花剌子模沙王纳过重税为提高货价的理由。成吉思汗不断地发言，且当众大发雷霆。难道他解决西辽，为的是使他人可以阻碍贸易吗？自由通商的保证在哪里呢？可是，他却收了货物，甚至付了高于商人所要的价格。这是一番精巧的动作；因为，从此以后，在亚细亚所有各市场上，大家都说蒙古大汗是赞助通商的。

不久后，一个蒙古商队，携带中国货物，来到了波斯帝国边界的锡尔河北的讹答剌（Otrar）城。在这个地方，即花剌子模的东境，花剌子模人的战争精神病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了。好战的青年，刚刚不费力地并吞了河中省，志得气盈，且作新战功的幻梦。讹答剌的守将便对商队弄出特别凶猛的刀声。他力拒相信商队是居心和平的。在他看来，这些蒙古人并不是商人，乃是危险的奸细。他于是扣留了商队，杀死了商人。

摩诃末，即使是不赞成这番动作，后来终于承认照此办理。他已经受了束缚，因为讹答剌这个疯狂的守将，同时是主战派的首脑，且为摩诃末母后所保护的人物（按即摩诃末的母舅）。

像成吉思汗这么伟大的人物，且自认为自由贸易的保护者，讹答剌城的年轻守将的轻率行为，等于火上添油了。可是，成吉思汗还是不采取报复的行动。他遣使往见沙王，提出抗议，并要求惩罚罪人。恐惧万一有和平存在之局的成吉思汗，设若不再施一个新的诡计，则沙王还可避免即将迫近的威胁降临。他以曾叛弃摩诃末的一个花剌子模的旧臣充当使团的首领。这必然成为挑衅的结果，而在天山西部，人们也认此为挑衅的行为。现在，主战派很轻易地制服了犹疑不决的沙王。蒙古使团的首领于是被斩首了，随来的蒙古人被剃去胡须发放回去了。

这样，双方只有决裂了！成吉思汗已把沙王带到他所指定的方向去了。现在，他可以履行其权力内的任务，因为“他的邻人不许其处于和平”。他当众流泪，表示受了屈辱。据说，他独自登山数日，向天祈祷，发了复仇的?誓。

至于蒙古军部方面，则积极做备战的工作了，有一封信寄予沙王。信里面只包含几个可畏的字，这几个字，在百余年中，曾震动了整个世界。这个沿用的公式，即蒙古的宣战书，这样写道：“你选择了战争，唯有上天知道我们两者如何结局。”